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7月15日第15期 总第161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61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一）

目 录

【专 稿】

胡鹏池 但燊 7·27上午，蒯大富究竟去哪里了？

胡宗式 再谈1967年北大文革中的三件大事——兼答常风、魏明的指责（二）

附一：聂孙之流就是不折不扣的“二月逆流派”（1864支队）

附二：三十五个为什么？（《多思》战斗队《新北大报》1967年8月25日）

附三：孙蓬一1967年4月12日在全校大会上的讲话（《新北大》1967年4月13日）

【书 评】

舒 声 读王复兴《抢救记忆》有感

【述 往】

岳瑞民 文革琐忆二则——我在北师大的日子

宋翔雁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四）——逍遥中的困惑

【读者来信】

1. 章铎纠错 2. 陈创闯谈宫香政之文 3. 张晓良谈159期封面

4. 杜光来函 5. 乔晞华谈皮皮侠的建议

【本刊声明】

【专稿】

7·27 上午，蒯大富究竟去哪里了？

胡鹏池 但桑

引子：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1968年夏季发生的“清华7·27事件”是改变文化大革命方向、影响亿万中国人命运的历史大剧。

然而，当这场大剧刚拉开帷幕的时刻，我们的主角蒯大富却不知跑哪儿去了？他从清晨6点左右开始，诡秘地失踪了整整一上午。当6个多小时后的中午12点多，蒯大富重回清华园时，两万八、九千名工宣队进了校，清华园天翻地覆。每当想起这件蹊跷事，一个熟悉的旋律就会在笔者的心头响起：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
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
放牛的孩子王二小！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7·27 诡秘地失踪了一上午的蒯大富，不经意间，化为新词，走进了红色旧调：

工宣队突然进学校，
蒯大富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不是他贪玩要去闲逛，
造反的司令真蹊跷！造反的司令真蹊跷！

一、凌晨6点时分，静斋走出三个“眼镜男”

7月27日凌晨6点时分，晨光熹微，一辆从北京体育学院（下文简称“北体”）开出的212大吉普停在了清华大学西区的静斋楼前。

静斋是清华的早期建筑，结构、设施都比较好。解放前后，这儿曾是女生宿舍，当今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学生时代就曾在此楼居住；文革前的静斋曾是清华留学生楼；文革中，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曾数度择址、移址，最终落脚在静斋寿终正寝。

大吉普响了几声喇叭。不大一会儿，从楼里走出来三个戴眼镜、打着呵欠的年轻人，严重的睡眠不足使他们脸色泛黄。那个方脸儿的是已然声名显赫的蒯大富蒯司令，长脸儿的是他副手、清华井冈山兵团二把手、“文攻武卫指挥部”总指挥鲍长康鲍二先生，另一位不方不长脸儿的是蒯的秘书段永基同学。¹

按照昨晚的商定，他们今天要去北京火车站接陈继芳。

陈继芳何许人？

女，祖籍山东，现籍沈阳，冶金系焊0班学生，预备党员，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核心组成员。

当年在造反派组织中几乎都有像陈继芳这样出类拔萃的女头领。她们一般不会是“女神”，不以模样俊俏、身材妖娆而扬名，但也不是一般人所想当然的脸大、脚大、主意大、嗓门高的“女汉子”，更不是只会喊喊口号、打打杀杀的“女魔头”。

当时，陈继芳芳龄21，风华正茂，立场坚定，敢作敢为敢爆粗口，常以“老娘”自居，掌控团派“干部办公室”（又称“二办”），直接领导“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与“十二人反党集团”两个专案组，是团派核心圈中一位有权力、有威信、有魅力的女头领。笔者前几年有幸看到她与夫君马小庄先生合著的《潮起潮落》，想不到像她这样“彻底革命”

¹ 据鲍长康先生近日回忆说，此行没有段永基，但蒯书中是有的。

本文中的段永基先生并不是重要角色，他的在场与否并没有紧要关系。考虑到蒯书是正式出版物，蒯又是本文主要角色，故仍以蒯的回忆为据。

的造反闯将，竟然也钟爱《红与黑》、《俊友》一类西方资产阶级的情色细腻而优雅的小说。可见上帝七天造就的两性运行的人类世界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在长达95天的清华武斗中（即史家所称的“清华百日武斗”，从1968年4月23日至7月26日），陈继芳的态度也不是始终很坚定。在4月22日晚团派总部决定发动武斗的“新航空馆会议”上，她是反对武斗一方的代表人物。武斗开始后，她有时果敢刚毅，有时犹豫彷徨。一周前的7月20日，陈继芳回老家沈阳看望父母亲，借机散散心，可能在行前与蒯头儿有一个“一周后回来”的约定，于是老蒯估摸着继芳在这天该回来了，兴师动众地约了鲍二先生与段秘同志一起去接站。

然而“估摸”毕竟是“估摸”，他们在火车站接了从沈阳始发开往北京的12次特快，但是没有接到人。

按照1968年的夏季火车时刻表，12次特快从沈阳始发时间是20点，到达北京是翌日清晨7:02分。我们假设蒯大富一行直接进了站内，如果列车正点，几分钟内就应该出结果。考虑到没有接到人后东张西望的时间，他们在北京火车站滞留至7点半左右也该死心了，随即就该打道回府了。又考虑到他们应该有吃早饭，上厕所这类必要的“纳新吐故”的程序，算来算去，9点左右也该回到学校了。¹

当然，如果那天的12次特快晚点，时间就无法估计了。如果他们不死心，还要等途经沈阳的其它班次，也是另外一种情况了。文革动乱中的列车晚点是常有的事，但从后续情节的发展看，这次是基本正点的，他们也没有等候另外的其它班次。²

¹蒯大富与鲍长康的新说法：

鲍长康于2016年6月24日10点22分在“微信群”中说：“我7.27上午与蒯一起（未有段永基），接陈未果，在车站旁一清真小饭馆吃了早午饭。”

蒯大富则于6月27日12点20分在同一“微信群”中贴出以《答胡鹏池》为题的帖子，其中称：“那天一早我和鲍长康去北京站接陈继芳，但没接到，在车站等了一会儿就走了。在路上找了一家饭馆吃了早餐”。

清晨六点左右出发，到八点左右，当然是肚子饿坏了，只能是吃早饭，不可能是吃“早中饭”。与一般的早饭的区别就在于多吃了一点，多花了三五分钟的时间。

²从上述蒯、鲍的帖子中，我们没有发现他们对列车晚点及转等另外车次的任何回忆。

二、2015年1月14日，无心亦有心的寻问

2015年1月10日，胡鹏池应邀出席在广州中山大学某学院召开的《周有光先生学术研讨会》并作嘉宾发言。会后，胡赴深圳探望朋友，住在老同学但燊家里。1月14日，深圳的清华校友安排晚间有一个十七八人的聚会，所以一上午，有私家车的但燊与胡鹏池一起驱车去深圳宝安区一所养老院看望老蒯，打算先聊天，然后下午接老蒯一起去赴宴。

那天也是一个好天气，寒暄后倒了一杯白开水开始聊闲。

与老蒯还能聊什么呀？除了健康，还不都是清华文革的那些旧事儿吗？蒯自不必说，胡、但二人也是清华初期文革的深度参与者，陈年旧事聊得津津有味。



图1 2015年1月14日，胡鹏池、但燊与蒯大富在深圳宝安区宝颐院的合影

我们曾经这样问老蒯：

如果7月27日的早晨你没有去火车站，如果工宣队负责人像找到沈如槐（清华井冈山414总部一把手）一样地找到你，一样地坐下来谈判，一样地讨价还价、妥协让步，后来的情况会不会不一样？

又如果7·27中午11点半，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打来的电话是你本人接的，你会不会多问一些问题？刘丰会不会多讲一些情况？后来的情况会不会不一样？

老蒯断然否定道：“这不可能，不可能有什么不一样！”

胡、但二人相顾一笑。

其实我们也认同老蒯的回答。蒯本身的固有属性与当年的行为惯性决定了他必然会武力对抗工宣队。除非是伟大领袖委托江青，或者亲自告诉蒯大富：这是我的决定。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看得出来，几十年来蒯大富自己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然而，我们却老想着这个问题。

中午在院内食堂便餐，老蒯请客，8元钱一份，有荤有素也有汤，福利院的伙食相当好。饭后在老蒯房间里休息，消磨时间，等着晚上与老蒯一起去赴宴。

胡站着看老蒯的简易书架上都有些什么书？看到唯有一本书包着皮儿，正要拿下来，老蒯说这是陈继芳的《潮起潮落》。

胡蓦然想起一年多前曾看过这本书（杨日胜校友送的）时，有个疑问久存于心。于是迅速翻到第117页，其中有段话：“七月二十七日这一天，蒯大富估摸着我会从沈阳回来，所以一大早便要了辆吉普车和鲍长康一起去北京火车站接我，没有接到。”

胡念了这段话后问：“老蒯啊！你们怎么仅凭‘估摸’就兴师动众去火车站接陈继芳呢？”

老蒯说：那是预先约好的。

胡说：这不大可能吧？陈的书中明明写的是“估摸”。

胡又问你们是什么时间出发的？老蒯一开始说是9点钟。胡说那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是9点钟，无论你走西校门还是南校门，门口都有无数工宣队的大卡车和人群了。

老蒯说：那就可能是7点左右。

但燊说：“7点是可能的，那时工宣队还没有到校门呢。”

我们又问他是从哪里出发的？是不是从体育学院？老蒯说差不多。

胡又问，那你与鲍长康、段永基是在哪里会合的？

老蒯意识到前面的说法有矛盾，所以改口说可能都是从静斋出发的，是前一晚从静斋向驻在北体的清华团派汽车队办公室打电话要的车（按：两派武斗期间，团派为防止414夺汽车，平时都将汽车集中在北体了）。

我们都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大，记忆陈述中的反复是很正常的，毕竟这是40多年前的事啊！

话题又回到“估摸”。

胡鹏池一再表示不理解：学校两派武斗正酣，你们一个司令，一个武斗总指挥，一个是你的秘书，怎么仅凭一个“估摸”就擅离学校去接人呢？陈继芳有这么重要吗？接陈继芳需要这样隆重吗？

老蒯的反应也很迅速：这有什么重要吗？

但燊说：老胡现在是作家，就喜欢抠细节。

胡鹏池说：那倒也不是。我只是想那天上午老蒯如果在学校的话，情况也许不一样的。结果你不在，鲍长康也不在，段永基也不在，家里没有可靠、得力的人主事，还不由着任传仲这个没脑子的人瞎折腾。

蒯大富说：那倒也是！

那天下午的聊天对此没有任何结论。

过了几天，胡鹏池回到家中又重新翻了翻《潮起潮落》，发现书中116页明明白白写着：“7月20日我回到了沈阳父母的身旁”。20日距27日仅一星期。

胡鹏池心想：也许陈继芳离京前与蒯大富真有“一星期回来”的约定，甚至还可能撂下一句话：“老蒯，你要派车来接我唷！”蒯回答：“那是必须的！”

7月27日当天波浪起伏、腥风血雨的“清华7·27事件”发生后，蒯大富终于在7月28日凌晨2点多钟作出了撤离清华的决定。撤离的队伍至少有上千人，那浓浓的夜色里蠕动着黑压压的一簇一簇的人群。

但蒯大富并没有立刻走，他与陈育延、段永基、张树友在明斋一起继续打电话联系中央而无果，还在新斋楼外的空地上与任传仲、崔兆喜、周大卫等团派要员就“撤不出撤”的问题又发生了争论，也许还对据守化学馆、生物馆、9003大楼的负责人有所布置后这才叫上司机，五人狼狈不堪且也无比辛酸地暂时离开这两年来带给他无数光荣与梦想的清华园，这一行直接去了六部口的北京电报局。但任传仲、刘才堂、崔兆喜等团派要员全都没有跟他走，蒯大富也没有要求他们同时撤。

蒯一行赶到六部口时已是凌晨四五点钟了，电报大楼还没有上班。张树友、段永基等使劲地敲门，将电报大楼的工作人员吵醒了。工作人员听说是蒯司令要给毛主席拍电报，这才破例在下班时间上了班。

蒯书（注：指《清华蒯大富》一书，下同。作者韩爱晶，但蒯大富明确宣布，此书是我与韩爱晶的合作，史实部分共同负责）346页及其它资料上，都称拍电报的时间是28日清晨5时30分，我们认为肯定不到5点钟。这里又有一个“小奇怪”之处：蒯书及蒯的各种回忆中都没有提到张树友的名字。据我们了解，张树友确是同行者。¹

蒯大富一下子给毛主席、党中央发了内容相同的六份电报，内容是：

毛主席：今天早晨，“杨余傅”黑手派了十万（作者按：电报原文是“11万”）工人包围洗劫清华园！清华井冈山在血泊中向毛主席呼救！向党中央呼救！

¹ 张树友：团派总部第三动态组组长。精仪系光7班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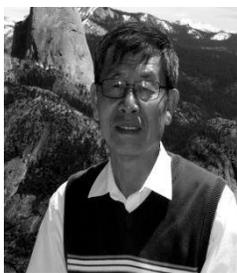
蒯大富后来回忆说：我们花了五十块钱，当时给不同的人，发了好多份。

发完电报快5点了，就在这样一种境况下，蒯大富还不忘掏出口袋里仅有的零钱给陈继芳发了一份电报：“暂勿回校，详情见信！”

你别说，蒯大富的“估摸”也真有一点“准头”啊！在沈阳的陈继芳果然准备在7月28日返校，上午她就买好了火车票。傍晚时分，当她“提着包，拿着火车票和母亲告别，走出家门的时候”，蒯大富的电报到了。看了电报，母亲拽下了女儿的行李包，陈继芳只好退了火车票。¹

三、校友周忠荣、樊程相继发来“火车时刻表”

张比同学于2015年1月14日在校友网开设“谢静宜披露毛制止清华武斗”话题，引发了校友们对“7·27事件”的关注与讨论。



胡鹏池的跟帖从“时间排序”入手，总感到“蒯大富去接陈继芳”这件事有名堂。2月5日，胡在网上发一则告示：“有谁能知道那个年代从沈阳到北京的火车，准点到达是几点钟？”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8小时后，在广东的校友周忠荣就发来回帖：鹏池兄：我这位家不在沈阳的同学来解答这个难题。我

图2 周忠荣校友 保存有1974年的全国火车时刻表。据记忆，1974年以前，全国的火车时刻表主要是增开列车。重要的特快、直快列车时刻变动不大。

下面抄录了与你探讨的事项有关的如下火车时刻（其他车次时间不对）：

车次	沈阳开	北京到
12次沈京特快	20:07	06:22
28次丹京直快	23:08	11:20

¹ 陈继芳、马小庄：《潮起潮落》，第116页。

正如忠荣所说，虽是1974年的时刻表，但那个年代的特快、直快时刻变动不大，所以暂可作为研究时的参考；又因为毕竟不是1968年的，心中觉得不踏实。

2015年4月份，校友樊程从美国回来。樊是沈阳人，其父曾长期在沈阳铁路局工作。4月26日，胡鹏池在常州与樊程见面时说起此事，樊程主动承诺回去找1968年的火车时刻表。但是樊回沈阳后在亲戚朋友中却都没有找到，热心的他最终却在在网上花50元钱购得了这件收藏品，随即发来照片。



图3 樊程校友



图4 沈阳开往北京的火车时刻表

我们据此制作了一张1968年经沈阳至北京的火车时刻简表：

车次	车种	始发站	沈阳开	到北京	备注
2	特快	哈尔滨	21.00	8.12	重点关注
12	特快	沈阳	20.00	7.02	重点关注
72/28	直快	吉林/丹东	23.22	11.48	一般关注
30	直快	大连	22.11	11.33	一般关注
42	直快	沈阳	15.00	5.00	无需关注

其中“12次特快”晚8点沈阳始发，上车就睡觉，一觉醒来到北京，到站7.02，不算太早。这是最佳选项。

前文已经说到12次特快没有接到陈继芳，蒯大富一行应该随即就返校。除去吃早饭、上厕所等所耽搁的时间，还考虑到那时大家都是穷学生，蒯等虽有支配公款的权力，但不至于大吃大喝。再说了，即使想喝点小酒，吃点海鲜，那年月的北京四九城，哪儿去找这样的地方呀？所以吃早饭的时间一定不会长。当年的市内交通也没有“塞车”现象，怎么算，蒯大富一行也应该在上午9点左右回到学校了。

可是，蒯书342页明确记载回校是“中午12点多”。那么在这3小时左右的时间内，蒯大富一行究竟去了哪里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关注。

老蒯最近在看了我们在微信发表的文章后，心中很不满，发帖说：“我回到清华时至多10:30”，“我肯定10:30前回静斋，当时工人还未包围静斋，所以我得以顺利进楼。”

1

但是，他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是怎样说的呢？

书中说：“十一点半钟……刘丰打电话到团总部找蒯大富，正巧蒯大富去火车站接陈继芳了。”

书中还说：“中午12点多，蒯大富、鲍长康、段永基等人回到清华。回到学校附近，看见工人队伍正浩浩荡荡往校园里开。蒯大富、鲍长康、段永基等人在人群中从西南门回到清华。鲍长康回忆是爬墙回的清华，蒯大富回忆说当时是在工人队伍旁边走进清华的，但轿车带不进来了。”

再看一段校史记录：“蒯大富12时后回校在静斋召集团派总部头头开会，指责这一行动是‘杨余傅黑后台背着中央搞的阴谋’，‘是来支持老四（414）压团派的’。”²

白纸黑字，何等清晰！如果老蒯现在要否定，不仅要否定自己书中的记载，还要否定自己有关访谈的记录，还要否定“清华校史”的记载，工程很巨大。当然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但总得拿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吧？

¹ 见上述蒯大富在“微信群”中《答胡鹏池》的帖子。

² 《清华大学一百年》，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第292页。

仅凭“我肯定”三个字，那就甭想做得到了！

老蒯真不是当年的老蒯了，现在的说话与文字毫无逻辑的严谨性，颠三又倒四，顾腕不顾头。老鲍要好一点，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

其实当事人如果能本着诚实的态度，要说清楚这件事是很容易的。说清楚这三小时（哪怕是“两小时”呢）去哪里了就行了。即使说去会女朋友，只要证据确凿可信，也行啊！

可是为什么搞来搞去说不清？只怕是“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

四、2015年3月后的再考证

机缘凑巧，但燊于2月底网购了两本书，一本是谢静宜的《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另一本就是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出人意外的是，吴德的书中竟有一大段关于“7·27”的内容，引录如下：

清华、北大的武斗制止不下来，毛主席决定同时组织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北大。后来的军宣队是由8341部队的人组成，迟群、谢静宜就是以军宣队的面目出现的；工宣队是由北京新华印刷厂发起，动员了三万多名工人组成的，拿着毛主席语录的小红本，开进清华宣传。

决定以后，谢富治让我赶快找蒯大富，让他表态服从这一决定。我派人找蒯大富，等了很长时间才把他找到，他不在清华，跑到北航去了。他来后，向他宣布了决定，要他拥护、执行这个决定。蒯大富答应得很好，说一定执行。

当时，想不让蒯大富很快回去，拖住他，利用谈话的时间使工宣队、军宣队顺利进去。我们在谈话时，工宣队就进去了。蒯大富提出他要回去了，就让他回去了。

哪知道蒯大富回去后，让“井冈山兵团”拒绝这个决定，并且利用他们自己制造的土武器和手榴弹打死了四五个进行劝导的工宣队成员，同时还打伤了几个。

组织进驻工作的是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副司令员李钟奇，他们就在距清华不远的的一个公园里指挥。李钟奇坐车进到学校后，“井冈山兵团”把他包围了，把他坐的汽车掀翻了，把他的文件包也抢走了。李钟奇回来后连说糟糕。我说，想办法把文件包要回来。

工宣队进校，遭到了“井冈山兵团”的武力对峙。这样不行，毛主席就召见“五大领袖”。参加会议的人有江青、谢富治、温玉成。我做具体找这些人的工作，会议开了不长的时间，就允许我参加了。¹

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当我们看到这段回忆，立刻联想到毛泽东“7·28召见谈话”中有一段内容与此呼应：

- 毛主席说：“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 吴德说：“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²

这是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7·28召见”时的唯一插话。显然，他的插话是为毛泽东的“间接打招呼”打圆场、作印证的，但也不是为讨好毛泽东所编的瞎话。

40多年来，研究与关注“清华文革”的人们（包括我们）大都以为所谓的“间接地打招呼”是毛泽东的搪塞与诡辩。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先生在一篇文章里针对这句话甚至气愤地责问道：“这叫什么话？招呼打了就是打了，没打就是没打，什么叫‘间接打招呼’？——这样的招呼无论直接还是间接，有过吗？显然没有。”³

秦教授在写那篇文章时大概并没有看过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该书于2013年1月就出版了。新近写文章前显然已经看过了，却又说“吴德的说法正是按这一逻辑编排的”。

据吴德女儿吴铁梅女士在该书“后记”中披露，吴德最早开始回忆这些事是在1992

¹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第44-45页。

² 《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

³ 秦晖：《“否定”并未彻底，“真相”仍待揭示》，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上），第16页。

年，当时79岁。吴女士说“这些回忆文章共15篇，父亲生前每篇都看过、改过，有些文章还找过了解当时情况的相关同志核实。”

我们认为亲历者的回忆一般都既有真实的内容，也会有错误的回忆与认知，关键要靠研究者自己去辨识。

对照吴德回忆，让我们倍感惊讶的是居然还真是打了“招呼”，而且这个“招呼”不仅“只能算”，而且“足以算”是“间接打招呼”了。

下面我们对此作详细分析：

1. 吴德书中讲得很清楚：“（7·27行动）决定以后，谢富治让我赶快找蒯大富，让他表态服从这一决定。”这难道不是“间接打招呼”的有力证据吗？

这里所出现的“决定”，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于7月24日上午向谢静宜布置的“决定”。

经过几天准备，又经过7月26日晚北京市委主要领导组织并出席的新华印刷厂会议，毛的这一“决定”就有了具体部署和实施细则。又根据毛的“保密”指示，吴德在向蒯大富传达时当然不会说是毛主席的决定，而很可能说是“市革委会的决定”。

吴德这句话的前后语境及接下来的具体内容全都表明：谢富治的“赶快”是指赶在当天工宣队进校前，也就是7月27日的上午10点前。

而毛泽东所说的“间接打招呼”，当然也是在行动前或是行动早期；如果到了下午五点钟，那还能叫做“打招呼”吗？

2. 吴德说：“我派人找蒯大富，等了很长时间才把他找到，他不在清华，跑到北航去了。”

谢富治要吴德“赶快”，吴德主观上也是“赶快”的，客观上却没能“赶快”得了。但这不是吴德故意拖延，是因为“等了很长时间”才在北航找到蒯。这正好说明蒯在北京站没有接到人后并没有直接回清华，而去北航了。

接下来就产生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疑问：蒯大富一行为什么去北航？

第一种可能：去北航找韩爱晶，交换对形势的看法或者采取什么合作的行动。但是，

蒯明知韩这一阶段在北体留学生楼养病，所以他即使要找韩也不会去北航。这第一种可能基本上不存在。

第二种可能：去北航搞武器。这种可能是存在的，而且已有前科（后文将提到）。

3. 吴德回忆说：“他来后，向他宣布了决定，要他拥护、执行这个决定。蒯大富答应得很好，说一定执行。当时，想不让蒯大富很快回去，拖住他，利用谈话的时间使工宣队、军宣队顺利进去。我们在谈话时，工宣队就进去了。蒯大富提出他要回去了，就让他回去了。”

由这段文字又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决定”的形式与内容。

吴德所宣布的“决定”，是以市革委会名义出现的“决定”。而且只是口头上的“决定”，当时并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具体内容必然是：“市委决定组建‘首都工人、农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

既然是市委的决定，总得有一个来由。那么这个“来由”又是什么呢？

可能是“为了落实《七三布告》与《七二四布告》，市委决定——”；

也可能“根据中央文革指示，市委决定——”；

还可能是两者迭加。

但一定有“来由”，没有“来由”的“决定”是不可能的。

根据“7·27”现场工宣队攻打武斗据点之前的各种宣传车的宣传与“最后通牒”等，可以推论，这个来由是“根据中央文革指示，市委决定——”。

当然，不会直接透露是毛主席的“决定”。如果透露的话，那么“毛主席的”这个定语是不可能被“省略”的，行文需用“根据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或“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

这不是咬文嚼字，而是那个年代政治生态之必然。

第二个问题：既然将毛主席的“决定”以“市委决定”的名义向蒯宣布了，吴德虽然不方便直接告诉是毛主席的“决定”，但为什么不能用面部表情或其它肢体语言向蒯暗示是毛主席的“决定”呢？为什么不“暗通款曲”、“泄露天机”，给老蒯卖个人情呢？

这里的原因，就一定要从吴德的人性特点、政治生态以及吴蒯之间的双边关系去综合分析。

1. 毛主席已经明确指示要“保密”。毛泽东在7月24日上午紧急召见谢静宜，布置完具体行动后又补充说：“注意啊，工人要派大联合、三结合好的工厂，派性少的工厂，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去，否则，你们还没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¹

仔细考量这句话，其实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说这是我的“保密指示”。所谓的“保密指示”是人们在解读这段话时的概括。

毛泽东也没有说这是一条“硬杠子”，他只是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注意啊”，但在“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在其它人的眼里就是一条“硬杠子”，谁敢不遵守啊？谁要不遵守，“吃不了，兜着走”。不要说谢富治不敢，吴德更不敢，连周恩来、江青都不敢。

只有说“注意啊”的毛泽东自己可以“不注意”，只有他才可以灵活掌握，相机行事。

2. 那么谢富治为什么又敢让吴德赶快找蒯大富呢？这又有三种可能性：或毛泽东对谢富治另有暗示或明示；或江青背着毛泽东对谢富治另有暗示或明示；或谢富治本人看在过去“老交情”的份上冒险打的“擦边球”。

从当时执行“保密指示”的过程看，可能性比较大的仍然是毛泽东本人的灵活掌握，他对谢富治另有暗示或明示，再由谢富治布置吴德向蒯大富传达。

无论是哪一种可能，到了吴德嘴里只能是“说半句、留半句”，让你蒯大富自己去体会，莫怪我预先没有打招呼，这就是间接给你打招呼。领会不领会是你的事，识不识时务是你的事，是死是活是你的事。

¹ 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记》，第177页。

3. 即使是“擦边球”，“擦”到什么程度？也是由“宣布”者自己把握的。吴德的政治环境与政治心态与谢富治大不一样。文革中谢富治一头栽在江青这一边，与江青走得非常近；吴德则与周恩来走得比较近；谢富治与蒯大富有点“老交情”，吴德与蒯大富不仅没有“老交情”，而且一向“没好感”。

吴德只是在办谢富治交办的“差”，这个“差”吴德心中未必乐意办。吴德只要一想到蒯大富平时如何“狗眼看人低”，不把他这个“吴书记”看在眼里，心中就有种种不乐意。所以吴德在“办差”时没有丝毫主观能动性，不愿意多说半句话，更不可能通过肢体语言让蒯大富去领会。

4. 韩爱晶对吴德的态度分析。吴德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第350页已经分析得很到位：“蒯大富经常去市革委会开会，对于市革委会吴德、丁国钰根本不放在眼里；对卫戍区黄作珍的话不会听，更是藐视李钟奇等人。”“市革委会有的干部更是老谋深算，就在看蒯大富自食恶果。知情人没人真心想帮蒯大富，也没有人想告诉他内幕。”

韩爱晶所说的“市革委会有的干部老谋深算”是指谁呀？毫无疑问，正是指吴德和丁国钰等一帮子人。

吴德是一个大浪淘沙、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他在文革这样险恶丛生的年代，从边陲省份的吉林调到政治漩涡中心北京来，并没有强大的后台，也没有可靠的老朋友，却能在极其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下有惊无险地生存下来，而且最终当上了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评价说“吴德有德，吴德是个老实人”，这充分说明此人必有过人之处。韩爱晶说他“老谋深算”，必不是虚誉。

韩爱晶此处说得微妙，变相地表明他有可能原先就知道“7·27上午吴德约见蒯大富”这件事。

另外，“7·28 召见谈话”是韩爱晶为主整理的，其中“吴德说：‘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这句话，也有可能是知悉内情的韩爱晶刻意保留的。韩也无法不保留，因为“7·28 召见谈话”是毛泽东亲自下令录音的。

至此，我们需要将时间再梳理一下：

1. 谢富治交办吴德赶快通知蒯的时间应在7月27日清早，也就是工宣队进校前。

2. 吴德找蒯的时间也在7月27日一清早，在北航找到的时间应是上午9点左右，蒯赶到市革委会的时间应在上午10点左右。

这时，东区工宣队已经进了清华，沈如槐正在与柳一安谈判，10点钟即达成了停止武斗的四项协议，并由主楼414广播台向全校广播。

3. 上午10点时，西校门外的工宣队还没有进入清华。任传仲亲率一支长矛队至西校门阻挡，工宣队没有强行进入西校门。他们一方面继续宣传，另一方面观察门内外情况，等候东门、南门工宣队的消息，更主要是等待临时指挥部的命令。

4. 上午11点不到，东门工宣队开进至主席像（即二校门）附近。东门进来的这支工宣队有6000之众，工宣队员们漫溢至西校门。西校门内外都是工宣队的人海，任传仲率领的数十人的长矛队就无能为力，回到静斋。任传仲一撤，西校门大开，工宣队大举进入清华园。这时是上午11点钟左右。

工宣队仗着人多势众，所采取的方针不是层层推进，而是按区域、楼群分工负责。其中有两个重要目标：团派总部所在地“静斋”主要由新华印刷厂的工宣队负责；团派广播台所在地“明斋”主要由针织五厂的工宣队负责——他们各自围楼完成后，一方面紧缩包围圈，另一方面并开始继续宣传与喊话。

5. 上午10点多至11点多，吴德在市委大楼向蒯大富宣布决定，蒯答应一定执行。吴对蒯不信任，拖住他，利用谈话时间使工宣队顺利进校。吴德得到工宣队进校的消息后就让蒯回去了。蒯大富离开市委的时间也在11点多。

6. 蒯离开市委后，吴德仍然不放心。上午11时30分，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三支两军”办公室负责人刘丰给团派总部打电话：¹“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去清华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七三布告’，请你们大力支持宣传队，并积极与宣传队合作。”

五、镜头回放四则

为了有助于解读吴德在“7·27事件”中的态度与立场，我们大量引用了韩爱晶的话对吴德的政治生态进行了分析。

同样，为了有助于解读蒯大富在“7·27事件”中的态度与立场，我们也必须对蒯的政治生态、政治品质作一初步的分析。我们通过回放几个历史镜头来进行这项工作。

镜头回放之一：蒯大富二下北航借枪

“北航红旗”保卫部长戴维堤在其著作《逝者如斯》专有一节《蒯大富二下北航借枪》，其中有一段极为绘声绘色的描写：

1968年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在北航主楼二楼的组织保卫部办公室里沙发上已睡觉，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蒯大富，只见他像监狱里逃出的犯人，头发胡子很长，披一件又破又脏的大衣。

“司令驾到，有失远迎。怎么如此狼狈？”我把他让进了屋。

“咳！别提了，差点让‘老四’打死！”蒯进屋后出了一口长气。我立即给他倒了一杯水。

“半夜鸡叫，定无好事，蒯司令有何公干？”我说。

“老弟救救我。”蒯大富一本正经，双手作揖，吓了我一跳。

¹ 不出意外的话，刘丰的这个电话是正在静斋总部的刘才堂或任传仲接的。正因有以上一系列情节，所以蒯大富回到清华的时间是12点多。《清华蒯大富》书中蒯大富原来的回忆的这个时间是可信的。

“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物有物，只要别武斗就行。有什么困难，说吧！”我十分慷慨。

“人，钱都不需要，只要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枪！”蒯大富知道，中央发了北航数千枝枪。

我心里顿时一沉。

“要什么都可以，只有这枪不能给，我说了不算。”我也学着耍滑头。

“谁说了算？”

“上面当然是周总理、卫戍区，学校里当然是韩老六了。”韩爱晶外号叫韩老六，那是电影《暴风骤雨》里的一个人物。

“那我找老六去。不过说好，只要老六同意给，你就得给我。”蒯很聪明。

蒯走了，他知道韩爱晶在体院留学生楼疗养。韩最近身体不好，吐血，周总理派自己的保健医生给他看了病。

蒯一走，我立即要通了韩爱晶的电话。

“蒯大富来要枪，怎么办？”我问。

“不给！”韩回答很坚决。

“他赖着不走怎么办？”

“你看着办吧，这事我不管。”韩把皮球踢了回来。

过了一会儿，蒯大富又来了，面露喜色。

“我找到老六了，他同意给。不要多了，几十支就行。”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是太上皇，说一不二，但这里是北航。北航红旗是一个战斗集体，韩爱晶比较民主，不像蒯大富那样独裁。

“韩爱晶同意了也不行。老蒯，你听我说，这枪绝对不能动。这不是木头棍，枪一响要死人的，你要考虑后果。”我正式劝他。

“‘4.14’有枪，把我的人都打死了。我的几支破家伙，不管用，吃了大亏。你给我枪，出了事是我的，与你无关，你放心好了。你们几千支枪，给几支怕什么，用完了还给你，神不知，鬼不晓。”蒯果然缠了起来，但我始终不松口。

当时，蒯也24岁，同我一样大（注：后来知道他比我小一岁）。我不能吹牛比他强，但在借枪这件事上，我确实理智得很，比他聪明。

蒯大富嬉皮笑脸，完全没有了蒯司令的风采，他开始在我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胡乱翻动起来。出于面子，我不理他，任他乱翻。他忽然走到保险柜面前，拍了拍说：“这里面肯定有枪，打开看看。”

我的天哪！里面确实有五支带子弹的“五四”手枪，幸亏门锁着。

“里面全是小偷流氓材料，没有枪。再说钥匙在秘书手里，我打不开。”我笑着说。

蒯一无所获，走过来一下子拉开了我办公桌的抽屉。我锁上已经来不及了。抽屉里恰好有几十发刚从学生手里收缴上来的各式子弹，真见鬼了！

“啊！子弹也行，我拿走了。”蒯一把抓起了包子弹的报纸，塞进了破大衣口袋里。

我没有再坚持夺回来，心想，反正是些杂牌子弹，没什么用，拿去就拿去吧，否则他缠着没完。

蒯终于很不满意地走了，临走说我不够朋友。

戴维堤最后说：“以上就是蒯大富深夜二下北航搞枪枝子弹的全部经过，绝对没有丝毫水分。”¹

请读者们（尤其是当年的清华校友）仔细欣赏一下老蒯的这段表演：

1. 明明团派有各种枪支30多支，414只有1支半（注：对此笔者另有论证），可是老蒯却在老戴面前装可怜：“414有枪，我的几支破家伙不管用。”

2. 明明团派于7月4日、5日、6日，连续三天开枪打死414三个人：朱育生、杨志

¹ 戴维堤：《逝者如斯》。

军、杨树立，7月18日又开枪打死了刚从家乡苏州返校的女同学钱萍华；而这期间，414既没有动过枪，也没有枪可动，更没有打死过团派一个人，然而老蒯却在老戴面前装孙子：双手作揖，“老弟救救我”，“414有枪，把我的人都打死了。”

当年的团总部委员陈女士在新帖中，一方面批评蒯大富“耍小聪明、又喜投机的政治品质”，¹一方面又为蒯辩护说“他还没有那么深的城府”。

其实，这只是反映了陈女士对蒯同志的个人看法。蒯大富是很有亲和力的，也很有女人缘，据说曾自称是“清华园的贾宝玉”。但他的另一面呢？要不是北航的老戴写出来，谁还能想到这枚硬币的背面竟有如此炉火纯青的表演天分呢？

在两年多在政治舞台上的摸爬滚打，蒯大富早已从理论上到实践中炼成了一个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

在清华初期文革的全过程，蒯大富的说谎不计其数。

“神不知，鬼不晓”正是蒯大富的一种思想方式，在他的脑子里并没有“人在做，天在看”的敬畏。

由于老戴头脑清醒，办事有底线，蒯大富二下北航，只是顺手牵羊地掳走了几十发手枪子弹。这个结果让老蒯很不满意，也不死心。此时的清华武斗正呈胶着状态，蒯大富的内心也许正酝酿着新的宏大计划（笔者按：点到为止），这就有可能计划“三下北航”去搞枪。

镜头回放之二：继芳离校的那个晚上，大富都干了些什么？

1968年7月20日，正是陈继芳离京的那一天。

也不知是因为继芳的离开，也不知道有其它的原因，大富心情异常烦躁。于是在这天晚上，就又有了异常的行动。这个行动是他翻身掌权后从来没有的，蒯大富又一次创造了一个小奇迹。

¹ 指叶志江校友在6月29日晚7:58在微信群中的一则帖子。这则帖子是陈育延女士应叶志江同学所写的一封信。

象棋规则，将帅不出窝。可是这一天的蒯司令竟然悄悄出了“窝”。

根据团派情治部门的准确情报，有一支几十人组成的414文职队伍，正计划于当晚向北京市内徒步转移。接到情报，崔兆喜（团派重要的总部委员、保卫组组长，外号“崔和尚”）跃跃欲试。一般情况下，遇到这种事也是崔和尚带队行动的。

在最近的一次总部会上，崔和尚曾经献过这样一个“惊天妙计”，他说：“真要是打死414一二十个，老四就根本打不了仗了，办葬事都办不完。”

真凶狠啊！

崔和尚的建议震惊四座，没想到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竟然是任痞子（任传仲，团派总部核心组成员，文攻武卫指挥部副总指挥，外号“任痞子”）。任痞子批评崔和尚的建议是希特勒的“肉体消灭主义”。任批评后，崔和尚语塞，蒯大富默言。

现在机会不期而至，崔和尚想去亲自带队实践他的“肉体消灭主义”，任痞子不表态，蒯司令却说我来。

夜深更漏，蒯大富亲率一支短枪队（不知有多少人，多少枪？）绕道北门，埋伏在林学院西的路北稻田的壕沟里。也许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漫长等待，子夜时分，只见有一支414二三十人的队伍黑乎乎地向东走了过来。这支队伍没有卡车，人们肩扛手抱着许多东西，队伍的前后左右都远远的分布着流动哨。

团派短枪队迅速出击活捉了路北的一名岗哨，这名岗哨还没有来得及喊叫，就被封住了嘴巴，随即被反绑了双手，扔在远远的稻田里，一名蒯兵用枪点着他的脑袋看守他（担负岗哨任务的这名校友是笔者的好朋友，其后的遭遇又是另一段悲惨而精彩的故事。老实说，笔者也不舍得一下子全都端出来，留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考虑到不久前谢富治曾经亲自打过电话，这段对话竟被414的人窃听并录了音。

谢：我找蒯大富同志。

蒯：我是蒯大富，谢副总理请指示。

谢：大富同志，你们不要打死414这么多人，这样让我在上面很被动。

蒯：知道了，一定遵照谢副总理的指示办。

谢：你小子不要说得好听！

蒯：是，是，是！¹

也不能排除蒯大富心中尚有些许的人性，他也会恐惧落下直接的人命血债，成为具体的杀人凶手。

所以，蒯大富并没有下令向密集的人群里开枪，而是等414的大部队已经过去了，后面只剩下落单的两三个人时，他这才下令开枪，而且还要求枪手们只打下身，不打下身。

这支短枪队一共开了四枪，一枪打飞了（还有一种说法：打伤了自己人）另三枪打伤两个人。

因为414的队伍是从西边过来的，老蒯的队伍埋伏在路北，所以两人中枪的部位都是左腿。

其中陈XX左腿被两粒子弹打穿，其中一粒穿过左腿又打中右腿，就留在了右腿里。陈XX中枪后，所抱的沉重的老式中文打字机跌落下来，压断了他的一条腿。

这就是清华文革中团派神枪手“两枪五窟窿”的神奇传说。几十年后的人们听说了这个故事仍然摇头不相信，以为是造谣。一位校友在自己的书中不屑地说：“神枪啊！”然而这却是真实的故事。

另一个中枪者是414中的“独行侠”光积昌，他的故事是另一类传奇。子弹从左腿打进去又穿了出来，两个窟窿眼，流了不少血，却没有伤筋动骨，也没有伤及大的动脉与静脉，一周后就下地了，行动如常。

啊！老蒯手下都是神枪手！陈、光二人却是程咬金（福将）！

圈内人都知道我所说的陈XX是谁？文革后他成为“大清王朝”的一名要员。他本来还可以有望在仕途上“百尺竿头”更升一步或两步，但他却说：都说朝里有人好做官，那是

¹ 唐金鹤：《倒下的英才》第三版，第329页。

老皇历；现在能不能有一个新皇历，朝里有人不做官啊！

笔者曾有缘与陈某得识一面，虽然没有说上几句话，却给我留下极为难忘的印象：那么的丰神俊朗，那么的玉树临风，人物啊！

镜头回放之三：蒯大富心中的太阳

“去接陈继芳”，芝麻绿豆大的一件事，老蒯一人招呼上司机就行了，为什么要同时出动三大要员？

年轻的读者可能会联想：莫不是二人在相恋，又或许老蒯在单恋。

而当年的清华两派群众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联想。

因为从1966年下半年蒯大富刚一造反就已经收获了爱情。当年的校园内虽然没有恶炒“明星八卦”，但蒯司令的“绯闻”仍然不胫而走。说的是蒯司令搞到了一个女中学生。当年的大学生们虽然都在青春期，但对两性关系都极保守、幼稚，且近乎愚昧，认为老蒯的行为就是造反派掌权后腐化堕落的表现。当年就有不少同学因为这则绯闻而反对蒯大富，理由是防止蒯大富这样变修了的造反派掌权。后来，这则“绯闻”逐渐被证实，很多人都知道21岁的蒯司令居然有一位16岁的恋人，是清华附中的高一学生刘X。传说中的刘X是一位“女神”级的校花，附中排球队队员，身高一米七几，面如满月，艳若桃花，且是从1966年“624事件”后，¹在蒯大富最困难的时期收获的“红颜知己”与“革命伴侣”。后来又知道她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不仅有出众的美丽，还有饱满的革命激情，是清华附中的造反派头头之一，当过北京市中学生红代会核心组成员。刘X热情且有主见，能帮老蒯拿主意。她几乎参与了蒯大富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全过程，连“井冈山”这个名字都是她给起的；连将陈继芳拉进“蒯核心”，也是刘X亲自出马促成的。蒯大富成立“井冈山”后也帮助刘X在附中拉起了一个山头，名字就叫“清华附中井冈山”。

¹ “6·24事件”是清华文革早期的比较重要的事件，既是工作组迫害蒯大富的开始，也是蒯大富开始造反的标志性事件。事件的详细过程及其解读参见胡鹏池《清华园的一只蝴蝶》。该文收于胡鹏池著《通俗政治》第462—501页。

据蒯书载：蒯大富曾一往情深地说刘 X 曾经是他心中的太阳。¹

所以，蒯与三大员一起去接陈继芳之事与私人感情无关，而是预先计划。

镜头回放之四：从戴维堤处掳来的几十发子弹到哪里去了？

人们不禁要问，7月中旬蒯大富从戴维堤抽屉里掳来的几十发子弹后来到哪里去了？

其实这样的寻问大可不必，在那个烽火连营、兵荒马乱的年代，这样的事情不过是小事一桩，能问出个什么名堂呢？也许不翼而飞了，也许扔进了万泉河（贯通清华园全境的一条河）。

然而，工宣队进校后还真把这件事搞清楚了。后来竟写进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蒯大富的《刑事判决书》里：

1968年7月27日，“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宣传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被告人蒯大富同另一头头任传仲等人紧急策划后，决定“抵抗、还击”，不让工人进楼。这一决定，向各武斗据点作了传达。下午一时许，蒯大富在静斋楼道拔出手枪，叫嚷着要和工人“拼了！”，并在离开静斋时把数十发手枪子弹交给了武斗人员。任传仲等按蒯大富“抵抗、还击”的决定，带领人员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宣传队员进行袭击，致使宣传队员王松林、张旭涛、潘志宏、韩忠现、李文元惨遭杀害，七百三十一人受伤。²

蒯大富当然不会去管理团派的“军火仓库”，他这“数十发手枪子弹”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因此断定，这其中就有一部分是7月中旬从北航老戴的抽屉里掳来的。

这正是“人在做，天在看”，“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¹ 《清华蒯大富》第385页。

²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终审判决书》（83）刑终字第42号，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六、两次“吴蒯会”，十点不相同

蒯书 343 页对 7·27 “上午吴蒯会”并无一字记载，却记载了“下午吴蒯会”：

下午五点左右，到了市革委会，段永基他们（笔者注：包括陈育延与司机）在外面等，我上楼去找领导。找谢富治没找到（笔者注：这清楚地显示蒯的目的不是找吴，而是找谢）。

我见到吴德的秘书，我说我想见吴德，后来就直接到了吴德的办公室。我一见吴德就喊：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来？一进校就抓人打人，把我们学校打得一塌糊涂！我和你们说，如果把清华井冈山当上海柴联司来砸，我们就以死一拼！

而吴德始终不说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也不说明这件事中央都知道。吴德说：蒯大富你要是得罪北京一百万产业工人，你在北京就没有立足之地。

我还跟吴德争：“我们不是好欺侮的，我们就以死一拼！”

吴德说：你们如果跟工人打起来，你要负责！

我说：现在没办法，一点招呼也不打，你让我负责我不负责！

吴德让我呆在那儿，让我们等，让等工宣队来，一直等到晚上 7 点钟。

两人书中各讲一次，但不等于只有一次。

笔者认为两次都存在，也即上午、下午各一次。

两次“吴蒯会”，十点不相同。

1. 时间不同：吴德回忆中的“吴蒯会”没有明确标明时间，是我们通过分析，确认是上午。因为吴德讲：“当时，想不让蒯大富很快回去，拖住他，利用谈话的时间使工宣队、军宣队顺利进去”，这当然是上午了。

我们推测开始的时间是在上午 10 点左右，结束则在上午 11 点多；而蒯大富回忆中“吴蒯会”，明确交待开始是下午 5 点左右，延续到谢富治回来后。

2. 主动与被动：吴德讲的是谢富治让吴德主动找的蒯大富，蒯是被动到的市革委。由于有“在北航找到蒯大富”的细节，这件事就具有了可信度。

蒯大富有动机，有时间，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所以“上午吴蒯会”就有了可信度。

“下午吴蒯会”是蒯自己主动去的市革委会。蒯一向对吴德不尊重，更重要的是上午已经见过了，所以蒯并没有兴趣再找吴德。蒯书中对此写得明明白白：他是去找谢富治的。只因谢不在市革委，退而求其次这才又见了吴。

3. 蒯大富下午出去究竟去找什么人？我们还可以这样推测，蒯下午出去的主要目的也不是找谢富治，而是找江青。

蒯书 343 页：“下午三点多钟，我和段永基还有司机三个人翻墙出了清华，又遇到陈育延——外面下着大雨，我们的车绕了一大圈，下午五点左右，到了市革委会。”“绕了一大圈”，这句撂下来的话表明，蒯大富有可能绕到钓鱼台（中央文革所在地），但是吃了“闭门羹”，这才又绕到市革委会。

4. 蒯大富的态度：上午吴蒯会，蒯表示服从决定，态度是好的。

蒯为什么态度好呢？这是因为他并没有把吴德的话放到心里去，他很可能认为还像前几天一样，来一支宣传队，游游行，喊喊口号，在清华园内转一圈，然后就走了。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这一回与以往根本不一样，所以他的态度没法儿不好。

下午吴蒯会，蒯的态度很蛮横，简直是“咆哮公堂”。蒯的态度为什么如此恶劣呢？因为他意识到“大事不好”，十分惊慌。他认为工宣队是黑手操纵的，他甚至认为吴德也是黑手一方的人。但是，蒯大富的恶劣态度不可能激怒吴德，心里有数的吴德态度很镇定，很严肃，口风仍然紧。

5. 吴德拖住蒯大富的目的：两次都有“拖住蒯”的情节。

上午吴蒯会，当时工宣队还没有进校，吴“拖住蒯”的目的是为了让工宣队顺利进校。虽然蒯已经明确表了态，但吴德内心是不信任蒯的。“拖住蒯”，至少可以减少一个不确定因素。

下午吴蒯会，工宣队已经遭到团派的武装抵抗，不久又传来团派武斗打死工宣队员的消息。吴“拖住蒯”的目的是为了等谢富治，同时通知工宣队的代表来与蒯谈判。而通知工宣队代表到市革委和蒯大富谈判，也只能是谢富治才能决定的。

6. 关于谈判：上午吴蒯会，不存在什么谈判，只通知蒯要无条件地服从市革委会的决定；下午吴蒯会，存在着谈判，而且是在晚7点后谢富治回到市革委会，迟群与谢静宜也来到市革委会后，在谢富治、吴德主持下的工宣队与蒯大富的谈判，并且在市革委会就已达成了初步协议。

7. 现场人员：上午吴蒯会，现场只有吴与蒯。随行人员鲍长康和段永基可能都在楼下车里等着。下午吴蒯会，工宣队的代表迟群与谢静宜，还有很多工人代表，是那些工厂的负责人；蒯方只有蒯大富与段永基两个人。下午同行的还有陈育延。陈女士去哪里了呢？这个问题是有点重要的。本文暂时不回答这个问题，免得枝节太多了。

8. 谢富治在不在现场？上午吴蒯会，没有出现谢富治。谢有可能在前线指挥部。下午吴蒯会，蒯大富只字不提谢富治，但实际上谢富治后来回来了。谢有可能从前线指挥部匆匆赶回来的。

邱心伟、原蜀育主编的《清华文革亲历》375页：“在市内，晚饭后，在谢富治、吴德、工宣队代表与蒯大富参加的会议上，谢富治命令蒯大富：停止武斗、撤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谢富治指示蒯大富与工宣队代表一起立即回清华实施上述命令。”

唐少杰《一叶知秋》中也有相同的内容，原始出处是清华档案馆。¹

9. 让蒯大富回去的情节：上午吴蒯会，除了让蒯回去外没有出现其它情节；下午吴蒯会，蒯、段是与迟、谢一起回去的，时间是晚9点左右了。回去后又在清华园中学的一间教室里继续谈判，一直谈到晚上10点45分达成最后协议。

¹ 邱、原书中所述是间接史料，据查引自唐少杰《一叶之秋》第27页第17行。胡鹏池曾于2016年1月18日为此专门打电话向唐教授咨询，唐明确地告诉此段材料来自清华档案，并估计谢、蒯见面时间是在晚7点半左右。

10. 后续情节：上午吴蒯会，蒯回去后推翻承诺，下令抵抗。实际上开枪的命令也是他下达的，于是发生血案；¹下午吴蒯会，回去后虽然达成协议，也广播了，但是协议没有发生作用，仍然发生了团派武装 100 多人对 9003 的反攻，并成功地重新夺回 9003 大楼，团派武装开了枪，造成了两死一伤的血案。

虽说两人各吹各的号，蒯头不对吴嘴，吴头也不对蒯嘴，但经过上述十点比照，我们发现，如果将这两次看作一次，则矛盾百出，相互不能兼容；只有将其看作是两次，才能分别独立存在。

我们推论的结果是：7·27 有两次“吴蒯会”。上午一次从 10 点左右开始，延续至 11 点半左右；下午一次从 5 点多延续至 7 点多。7 点多后，谢富治回到市委后就演变成“谢蒯会”；再延续至 8 点左右，就演变为以谢富治、吴德主持的蒯方与工宣队之间的“谈判会”。

王二小被鬼子抓去带路，蒯大富被吴德缠住开会。王二小将敌人带进了埋伏圈，蒯大富被工宣队困在了清华园。王二小被鬼子挑在枪尖，蒯大富被毛泽东送上祭坛。王二小为抗日而牺牲，含笑于青石之上，蓝天之下；蒯大富为造反而遭贬，鸣冤于公堂，吞声于阶前。

六、蒯大富“情何以堪”？战友们“堪何以情”？

如果“上午吴蒯会”成立，毛泽东所说“间接是打了招呼的”不仅成立，而且有着丰富而实际的内容。

如果“上午吴蒯会”成立，蒯大富所说的“他们为什么封锁消息、没有说出工宣队是

¹ 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终审判决书》（83）刑终字第 42 号（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所载：“下午一时许，蒯大富在静斋楼道拔出手枪，叫嚷着要和工人‘拼了！’，并在离开静斋时把数十发手枪子弹交给了武斗人员。任传仲等按蒯大富‘抵抗、还击’的决定，带领人员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宣传队员进行袭击。”我们认为这段史实表明，蒯大富正是通过他的实际行动下达了开枪的命令；此外他还对任传仲下过“不惜一切代价抵抗”的密令。

毛主席派来的？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¹就是事后推诿塞责的谎言。

请注意，蒯大富的上述排比句并没有讲到“只要是北京市委派的”。这既可认为是疏忽，也可认为是“心虚”。

吴德回忆中只陈述了“上午吴蒯会”，只字未提“下午吴蒯会”。吴德写回忆时已经80岁，早已安全着陆，没有利益“动机”。美化自己的愿望也许有，但在这个具体的问题上是没有的。即使有错忆或遗忘，也只是自然失忆，而不是选择性失忆。

蒯大富回忆只陈述了“下午吴蒯会”，只字不提“上午吴蒯会”。但是蒯大富是有“动机”的，是选择性失忆，而不是自然失忆。

同样“只字不提”，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我们要有不同的判断，这不是厚此薄彼，而是明察秋毫。

近年来，回忆并研究“清华7·27事件”不时成为我们这一代清华校友所关心的话题，不时就有一些传言传过来：团派总部委员甲说：“7·27那天，蒯大富从头到尾都在说谎”；团派总部委员乙说：“7·27那天，蒯大富整个儿一个编故事”。

这两名总部委员都是7·27的全程参与者，也都是当年蒯大富信任重用的人，他们“话中有话”，欲说还休。他们想向人们暗示什么呢？又有什么内涵呢？当初是百思不解，现在是“原来如此”！

当然，推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们现在仍然无法解决的问题是：

1. 当7·27上午11点半许，蒯大富走出市委大楼时，他如何面对等候在车内的鲍长康和段永基？有没有向他们传达吴德宣布的决定？如果传达，传达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告诉他们自己在市革委会的表态？

¹ 几十年来，蒯大富谈到“清华7·27事件”时，总忘不了这一条：“他们为什么封锁消息，没有说出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这样的话，他在《岁月流沙》中讲过，对一些来访者也这样讲。我们将此称作“蒯大富情结”。

2. 当蒯大富 12 点多回到清华后,在静斋召开总部会议时,他如何面对众多总部委员?有没有传达吴德宣布的决定?又如何说服大家相信工宣队是“杨余傅的黑后台”操纵的?

如果“上午吴蒯会”成立,那么蒯大富的谎言从他上午 11 点半左右离开市革委会大楼开始。蒯大富欺骗了毛泽东与党中央,但这现在已经并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他有没有欺骗了他的战友与一般群众。因为他们还活着,还老而不死,虽然死亡已在不远处向他们招着手,他们却还想将此生活得明白些。

蒯大富面对昔日战友与一般群众“情何以堪”呀?而他的昔日战友与一般群众,又将“堪何以情”呢?

七、对于逻辑推理的“结果”,只能“谨慎自信”

推理毕竟是推理,并不是实证。所有的刑侦过程全都是依据调查第一现场、第二现场、延伸现场等得来的线索所进行的推理,再由推理寻找并发现、确定并确认实证,没有实证的案例最终是不能定案的。

推理都是在尽可能多的掌握史料的条件下进行的,而能取得正确的结果,必然是“前提要正确”,然后才是常识与逻辑。但是“前提要正确、常识要丰富、逻辑要致密”这三项条件都是有弹性的,都有相对性。

所以,我们在分析历史事件时,推理固然必要,过程务必谨慎。即便如此,我们对于辛辛苦苦得出来的结论,仍然只能持“谨慎自信”的态度。

正因为如此,我们相信本文仍会有一些错误,只是我们自己目前并不知道它在哪里?而迄今为止对本文提出批评与质疑的蒯、鲍、陈等各位老校友、亲历者,并没有拿得出足够有力的实证与分析。他们的帖子没有说到点子上。

尽管如此,他们的帖子仍然有意义,使得细节更丰富了,使得我们的思考更深入全面了,对他(她)们的感谢也是必须的。

所以，当我们将这些主观上的、自以为“致密的逻辑推理”所得出的结论放在这里的时候，仍然要有“一颗诚心，两手准备”。所谓的“两手准备”是指：既等待着你来赞成与附议（包括沉默）；也等待着你来反对与推翻。

如果你要反对它，你就要花功夫。你必须要先读懂我们的文章，指出我们的“逻辑推理”哪些不“致密”，哪些有“破绽”？“不破不立”！“破”了我们的，还要“立”你自己的。你要自己拿出一套更致密的推理，这是必须的。

如果你要推翻它，你就要举得出令人信服的实证来。如果你“反对得逞”，“推翻得逞”，我们就应该采取真诚欢迎的态度，这也是“必须的”。

研究任何历史事件当然都会有“是与非”和“对与错”，这既是目的，也是本旨，是不能含糊的。但其目的并不在于证明“我对你错”、“我是你非”，而是为了“用真相淘汰假相”，“让真理战胜谬误”，将“劣币”驱逐出历史研究的市场。

真诚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具备这样的胸襟与气度，何况我们都是70上下的人，早已过了“血气方刚”、“争强好胜”的年龄。如果你能证明“你对我错”，我们共同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颗诚心”。

大海是宽阔的；比大海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人老了，“人书俱老”，这句话也听老了，但又有几人能做到？就从我们自己做起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进行的“逻辑推理”仍然是“抛砖引玉”。

也许有人说，你这种说法不是婆婆嘴吗？正过来说有理，反过来说也有理。

正确的思想方法就应该是这样。自然数列从1+2加到10等于55，反过来从10+9加到1仍然等于55。■

【专稿】

再谈 1967 年北大文革中的三件大事（二）¹

——兼答常风、魏明的指责

胡宗式

三、关于反对关锋、吴传启团伙

笔者在《三件大事》一文中提到了 1967 年 4 月 10 日，聂元梓和孙蓬一向陈伯达、江青当面陈述了对关、王一伙的意见的事情。当时中央文革如日中天，聂、孙提出的意见，不是一般性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直指关、王一伙“结党营私”。“结党营私”，那就是野心家了。这样严重的指责，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提出来的，不但说话要有根据，而且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诬告是要反坐的。此事关系重大，在当时当然是严格保密的。《三件大事》中说，“此事详情当时没有传达过”，这里说的是“详情”，并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传达过。有的事，如关于吴传启的话，传达一句就够了。

聂、孙这次去见陈伯达、江青，最重要的一点是看到江青对吴传启的表态有了变化。就在几个月以前，江青要陶铸去学部宣布吴传启是“左派”时，因为陶铸坚决不去，并指吴传启是国民党员，江青还和陶铸发生了激烈的冲突。²但这次江青的口气有了变化，这使得开展揭露吴传启的行动有了可能。聂、孙回来后传递出来的信息，内部传达的就是江青的一句话，大意就是吴传启历史上有问题，政治上要同他划清界线。新北大公社有不少人知道这句话。这句话后来也传播到许多兄弟单位。公开传递的信息，就是孙蓬一 4 月 12 日的讲话。这份讲话，等于是对吴传启一伙的宣战书，校内校外，影响很大。

¹ 此文（一），见《记忆》152 期，北京大学文革专辑（八）。

²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453—455 页。

《常文》写道：

既然此事详情当时没有传达过，胡宗式也是多年后才从孙蓬一的来信中获知这件事情的经过，在北大现有的报刊和档案中也都没有记载，怎么能够要求《北京大学纪事》写出聂孙和关锋、王力“斗争”的内容呢？再说，聂元梓和孙蓬一向陈伯达、江青陈述对关锋、王力的意见，也不代表他们就是和关、王进行斗争，而他们和吴传启之间的矛盾，顶多就是文革中不同派别、不同组织之间的矛盾，也不能代表他们就是正确的。胡宗式把文革中聂孙与潘吴之间的斗争看成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而在当时知道他们之间斗争的人在北大也只是少数人，即使到现在，有很多北大校友，都没有听说过潘吴是何许人也，可见他们与潘吴之间的斗争，实在不值一提。胡宗式在这个问题上小题大做，不过是为了给聂孙表功，而《北京大学纪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多费笔墨，也是很正常的。

《常文》的这段话，涉及到两个问题，我们逐个进行探讨。

第一个问题，就是北大反吴传启的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一件大事还是一件小事，这是争论的关键所在。笔者以为，王、关、戚和吴传启一伙，利用文革这个机会，结党营私，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一件大事。实际上，诚如后来毛泽东所指出的，“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¹王、关、戚身居中枢，暗中操纵吴传启一伙，并欺骗利用某些群众组织，拉帮结派，朋比为奸。吴传启一伙仗着自己的关系网，狐假虎威，呼风唤雨，不可一世。任何一个正直的人，只要看出来这些人在结党营私，就不能不闻不问。但反对他们又谈何容易。王、关、戚是中央文革的要员，是不能碰的。不过，这个团伙也有薄弱点，那就是吴传启。吴传启是王、关、戚团伙中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历史复杂，问题甚多，曾遭学部总队的揭发批判，但因为他同关锋有着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学部总队终遭失败。吴传启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物，聂、孙选择的突破口，依然

¹ 逢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4页。

是吴传启。在当时，公开反吴传启，依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所以，聂、孙在准备公开揭露这个团伙之前，接受了其他同志的意见，决定先向中央报告一下，这才有了聂、孙4月10日去见陈伯达、江青的事情。

《常文》认为，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实在不值一提”。《常文》还认为，“聂元梓和孙蓬一向陈伯达、江青陈述对关锋、王力的意见，也不代表他们就是和关、王进行斗争，而他们和吴传启之间的矛盾，顶多就是文革中不同派别、不同组织之间的矛盾，也不能代表他们就是正确的。”

《常文》的这种说法，同北大“井冈山”当年的说法和做法完全不同，不符合历史事实。

当年陈伯达6.5讲话以后，北大蜂拥而起的各色反对派，以及后来的“井冈山兵团”，从来没有把北大反吴传启的事情当作一件小事情，从来没有认为这仅仅是“不同派别、不同组织之间的矛盾”。“小题大做”的并不是40多年后的胡宗式，而恰恰是当年北大的反对派。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在北大夺权。如果当年的反对派有《常文》现在这样的认识，他们就不会闹起来了，也闹不起来了。《常文》表达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否定了北大反对派当年的所有作为。既然反吴传启的事情仅仅是“文革中不同派别、不同组织之间的矛盾”，“不值一提”，那你们为什么要在陈伯达6.5讲话后大闹起来呢？

“不值一提”，本来是陈伯达6.5讲话里的说法，是为了打压新北大公社揭露吴传启的行动、在北大挑动分裂而说的。聂、孙虽然当面对陈伯达、江青说关锋、王力和吴传启一伙“结党营私”，但要公开这样说还是不行的，只能利用江青对吴传启态度的变化，先揭露吴传启。陈伯达6.5讲话说吴传启的问题“不值一提”，就是要引起北大群众对反吴传启行动的怀疑。果然，蓄谋已久的分裂者有了借口，指责聂、孙“分裂中央文革”的口号一时甚嚣尘上。“分裂中央文革”在当时是一项严重的罪名，一些天真的人们相信了陈伯达的话，对聂、孙产生了怀疑。于是，北大就大规模地分裂了。

北大公开反吴传启，始于孙蓬一的4.12讲话。孙蓬一的4.12讲话并没有把地质“东

方红”当作敌人，矛头所向，是吴传启一伙。但地质“东方红”1967年4月16日就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指责孙蓬一“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文革……恶毒地挑拨中央文革内部的关系”。¹地质“东方红”都是些明白人，当然知道吴传启是什么人，知道吴传启不是随便可以反的，知道公开反吴传启意味着什么。他们选择站在关锋和吴传启一边。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加上孙蓬一4月13日“炮打谢富治”的讲话，他们认为，“这两篇讲话的问世绝不是偶然的，它是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宣言书，是北京市反动保守势力向革命造反派猖狂进攻的总动员令。这两篇讲话的抛出，使得北京市反动保守势力的气焰，一时又甚嚣尘上。”²明白人就是明白人，他们看出来这“绝不是偶然的”。孙蓬一的4.12讲话确实不是偶然的，但其性质要由后人来评判。

孙蓬一的4.12讲话获得北大许多师生的支持，反对者则在暗中窥测时机。反对者并不认为反吴传启的事情“不值一提”，而是认为可以借此大做文章，借此推倒聂、孙和校文革，搞垮新北大公社的。

笔者有幸读到《新北大报》刊登的一篇题为《三十五个为什么？》的文章。³该文表明，在陈伯达6.5讲话两个多月以后，北大“井冈山”还在这个被《常文》认为“不值一提”的问题上大做文章。笔者把这篇文章作为本文的附录，读者一看自明。这里列出其中的几个问题并略加说明。

7. 为什么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前夕、聂元梓、孙蓬一煽动数千群众炮打谢副总理？为什么与此同时北大出现了炮打、影射关锋、林杰的大字报？

说明：作者没有提出证据，是哪一份大字报“炮打、影射”关锋、林杰了。据近来的了解，新北大公社“红梅”战斗队曾经贴出过一份影射关锋、林杰的大字报，但不知道《三

¹ 见地质学院革委会和东方红公社4月16日发表的《关于目前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几点声明》，见《东方红报》1967年4月×日（我们的资料是用照相机拍摄的，日期看不清楚）。

² 见地质学院革委会和东方红公社4月16日发表的《关于目前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几点声明》，见《东方红报》1967年4月×日。

³ 新北大井冈山兵团编辑出版：《新北大报》，第七号第三版，1967年8月25日。

十五个为什么？》的作者指的是否就是“红梅”的大字报。

8. 为什么北大的一个普通校刊编辑吴子勇能绘出触目惊心的反革命“四月形势图”，在反革命“四月形势图”中列出了一股来自中央文革，另一股来自中央军委的所谓的“反新北大逆流”，这又说明了什么？

说明：吴子勇是中文系学生、《新北大》校刊编辑，在四月份贴出一份大字报“四月形势图”，其中用××——××——××，影射林杰、关锋、康生。当时民间确实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林杰、关锋、康生是一条线上的，因而这并非吴子勇首创。但这都是心照不宣的事情。特别是关锋和康生之间有什么关系，是高层的事情，笔者无从知晓，也没有听到有谁解说过，或者提出过什么证据。吴子勇的大字报当然是鲁莽之举，而且此事一直被报告到康生那里，康生后来也以此指责北大。

11. 为什么在陈再道跳出前夕、军内两条路线斗争十分尖锐的形势下，聂元梓的嫡系“炮兵营”大肆鼓吹，一论再论要“大树特树解放军的绝对权威”？

说明：“炮兵营”是历史系的一个战斗队，人数不详，笔者同他们素不相识。大字报的内容和贴出的日期都没有查到，从题目来看是主张拥军的。7.20 武汉事件前后，出现了一股反军逆流。在当时形势下，“炮兵营”一论再论要“大树特树解放军的绝对权威”，诚属难能可贵。这个问题同时说明了一个事实：在 1967 年 8 月 25 日的时候，《新北大报》还在坚持抓军内一小撮的观点。他们没有注意到，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已经不提“军内一小撮”了。

13. 聂、孙在北京大搞微不足道的人物吴传启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为什么陈伯达同志说：“以为利用吴，一下子打中了，可以把报纸中央的权夺过来了”？

说明：孙蓬一 4.12 讲话后，新北大公社的人都知道有吴传启这么一个人物。陈伯达

6.5 讲话后，北大的反对派一直在拿“不值一提”的事大做文章，声讨聂、孙“分裂中央文革”，直到8月25日，《新北大报》还在拿这个问题做文章，追问“聂、孙在北京大搞微不足道的人物吴传启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而时至今日，《常文》居然还在说“许多校友不知道潘吴”，自欺乎？欺人乎？

14、为什么聂元梓“6.4”讲话中说：“新市委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批判彭真、革委会成立两个月未批彭真……”这是什么意思？

说明：笔者看到这一条时，一开始还真不明白文章的作者为什么要选中这一条，其用意何在。经过一番查找，终于查到了聂元梓6月4日的讲话。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刊登在新北大内部动态编辑部1967年6月5日编印的《校内动态》第75期上。（图一）现选录如下：

新北京市委的最大错误是对旧北京市委没有彻底批判、彻底砸烂。我们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高高举起革命的批判大旗，狠批北京旧市委。我们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几个文件，批判几个坏电影、坏剧本。从文艺路线的批判上展开，联系到对旧北京市委和教育系统进行批判。对刘邓和旧市委的批判可以从此开刀。具体怎样做，大家可以提意见。抓叛徒仍然要进行，这是大方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为了批判刘邓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组织路线。揪斗潘吴的工作完全可以继续进行。

聂元梓这个讲话的关键一句是：**揪斗潘、吴的工作完全可以继续进行**。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三十五个为什么？》选用该条的原因，这个问题针对的内容隐藏在省略号里。聂元梓、孙蓬一1967年4月10日向陈伯达、江青提出了关锋、王力、吴传启一伙结党营私的问题，随后便发起了反潘、吴的行动。这让中央文革坐不住了。5月27日陈伯达、关锋、戚本禹一起找聂元梓谈话，进行威胁，陈伯达说：“你不要反吴传启了，更不要把他和我

们联系起来。”因为聂元梓不听话，陈伯达6月3日又在公开场合针对聂元梓、孙蓬一进行了严厉的、不点名的指责：“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很严肃的斗争，不是儿戏，不是赌博，不是押宝，不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不要犯儿戏的错误，……写这种标语的人算老大吗？老子天下第一，自己来当革委会主任，革委会主任不是自己封的，是大家推的，是大家协议选出来的。”¹

陈伯达的指责气势汹汹，不讲道理，只有恫吓，但这没有吓倒聂、孙和北大校文革。6月4日晚在东操场召开的全校大会上，校文革副主任姜同光把陈伯达6月3日的讲话向全校作了传达，随后聂元梓在讲话中作了针锋相对的回答：“揪斗潘吴的工作完全可以继续进行”。

40多年后，《常文》说：“北大人以北大出现聂元梓、孙蓬一这样的败类感到耻辱。”文革遗风之一是以一派代表全体。《常文》的作者光大了这种遗风，以一己之资格代表全体北大人。北大真正的耻辱，是被迟群和谢静宜所完全控制。他们不仅控制了北大，还控制了清华。这是世所罕见的事情。他们通过持续不断的清查、清理运动，以及在血吸虫病重灾区设立五七干校，整治、迫害两校众多的干部、教师和学生，把两校打造成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堡垒。尤其在北大，反对的声音遭到彻底镇压（清华还有刘冰等人敢于向毛泽东上书举报），人人噤若寒蝉，还出现了“梁效”这样为“四人帮”服务的御用工具，其祸害及于全国。什么是耻辱？这才是耻辱！

¹ 1967年6月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陈伯达、江青、康生等接见外事口系统革命造反派的讲话。载于《毛主席的新北大》，新北大公社《火车头》编辑部，1967年11月，油印件。



图一 《校内动态》刊登的聂元梓1967年6月4日的讲话要点

《常文》说：“聂元梓和孙蓬一向陈伯达、江青陈述对关锋、王力的意见，也不代表他们就是和关、王进行斗争，而他们和吴传启之间的矛盾，顶多就是文革中不同派别、不同组织之间的矛盾，也不能代表他们就是正确的。”

这是《常文》作者现在的一种狡辩和诡辩。聂、孙向中央文革领导举报关锋、王力、吴传启一伙，说的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直指要害，指责他们“结党营私”，这不是斗争，难道是勾结吗？至于聂、孙和新北大公社揭露吴传启一伙，究竟是“文革中不同派别、不同组织之间的矛盾”，还是什么别的矛盾，上文已说了许多。尤其是《新北大报》自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借此机会，笔者再补充一篇材料，看看当年北大“井冈山”究竟站在哪一边。

1967年8月31日出版的《新北大报》和《新人大》合刊，发表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七纵《长缨在手》斗战队（原文如此——引者）的一篇文章，题为《斩断伸向中央的这只黑手》。（图二）

文中是这样指责聂元梓的：

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五·一六通知》发表以后，她抛出所谓“揪出新的黑线”的反动论调，扬言“只出来一个陶铸嘛”，要揪出“新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抛开主席指出的大方向，企图重搞一个资产阶级的方向；她自称“江青派”、分裂中央文革，在全市全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政治混乱；她以“林杰—关锋—康生”的反动逻辑冲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企图从极“左”或极右的方面来动摇中央的领导；她一手炮制了什么“摘桃派”的理论，为其全面夺取市革委会大权制造反动舆论，并直接策划了炮打谢副总理的罪恶活动……

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关锋、王力已经垮台。但是，一些被陈伯达6.5讲话搞昏了头的人，还迷失在王、关、戚制造的迷雾中，沉湎于自己制造的舆论和幻想中，处在吴传启的手下王恩宇、洪涛等人的误导下。他们对于社会上已经出现的变化征兆茫然无知，自己身后的黑手已经被抓，却还在那里抓别人的黑手。聂元梓什么时候说过“揪出新的黑线”、“揪出新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类的话？聂元梓什么时候自称过“江青派”？这样说有什么根据？至于“摘桃派”一说，孙蓬一的4.12讲话讲得很清楚，指的是吴传启一伙。事实证明这并非杞人之忧，而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事情，其怵目惊心，远非平民百姓所能想象。至于4.13“炮打谢富治”，并非聂元梓“直接策划”，反倒是聂元梓赶来直接阻止的。文章指责聂元梓“分裂中央文革”，“以‘林杰—关锋—康生’的反动逻辑冲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企图从极‘左’或极右的方面来动摇中央的领导”。笔者认为，“林杰—关锋—康生”的说法，社会上虽有此传言，但聂元梓从未这样说过。聂元梓当年的认识水平，最

初仅至吴传启、关锋、王力而已。之所以找陈伯达、江青提意见，正是为了维护无产阶级司令部。企图“冲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动摇中央领导”的，不是聂元梓，而是王、关、戚一伙。文章题为《斩断伸向中央的这只黑手》，是把聂元梓当作黑手的。其实，在该文写作和发表之时，真正的黑手已被斩断，那就是关锋和王力。文章作者极力维护关锋、王力、林杰、吴传启这一伙真正的黑手，而把坚决反对关、王、吴一伙的聂元梓打成黑手，说明文章作者及其同伙完全站在关、王、吴一边，充当关、王、吴一伙的帮手和打手。他们的这段历史不很光荣。但不同的人，对待历史却有着不同的态度。其中有的人很快就认识到“保关锋、王力是错误的”；也有的人不敢承认，不肯承认，40多年后还在千方百计地进行狡辩和抵赖。但这是无法抹掉的历史事实，狡辩和抵赖都是没有用的。

顺便说一下，在关锋、戚本禹、林杰、吴传启、林聿时一伙眼中，北大反吴传启的事情，决不是一件“实在不值一提”的微不足道的事情，而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们本来正做着到处篡权的黄粱美梦，一下子被聂、孙和新北大公社的行动打破了。如果这是一件“实在不值一提”的小事，他们为什么要慌忙地组织“收缩”呢？潘梓年、吴传启和林聿时为什么要逃亡外地呢？那时要到外地躲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钱不成问题，粮票不好办。所以，王恩宇不得不在学部联队内部为他们募集全国粮票。即便北大在陈伯达6.5讲话的高压下暂停了揭发吴传启的行动，他们仍然非常紧张。现举几例：1967年7月，王恩宇从石家庄探望吴传启回京后，给林杰去电话，林杰对王恩宇说：“关锋、戚本禹同志说，叫学部继续采取收缩的办法，你们不要到外面活动，你们的每一步都要同上面联系一下，打个招呼，现在他们收到不少潘、吴的材料，所以你们现在不要看表面上北大不搞了，将来会有一场大的斗争，这场斗争必然会采取连锁反应。你们注意一下，关锋、戚本禹同志说，你们要顶住，越是困难越要顶住。”7月中旬，林杰还对王恩宇说：“关锋、戚本禹同志的意思，是叫你们快点调查，潘、吴的问题是个大问题，牵涉面很大。……他们搞潘梓年是个陪衬，搞吴传启才是真的，主要通过吴传启搞关锋、戚本禹他们，这才是目的。”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林聿时从赞皇王家坪回京后，找王恩宇去他家，林对王说：“潘、吴

的问题是个大问题，不是小问题，他们在外面还要住半年一年的，这是老关老戚的意思。……潘、吴的问题是个大问题，很可能是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焦点。”¹ 类似的例子还有，限于篇幅，兹不赘言。

陈伯达 6.5 讲话虽然对北大起到了暂时的打压作用，却在更大的范围里引起了人们对这个团伙的注意，人们的关注度更高了。北大内部因为聂、孙“分裂中央文革”的问题越是大乱，问一个为什么的人就越多。陈伯达是中央常委，又是中央文革的组长，他的讲话的影响力，是要远远地胜过孙蓬一的。陈伯达在讲话中一再提到吴传启，吴传启就更加声名远播了，想要低调已经太晚，化名远遁也无济于事。陈伯达没有肯定吴传启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也没有说不能反对吴传启，而是极力贬低他，这对吴传启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林聿时就此对陈伯达非常不满，声称“搞潘吴的问题和伯达同志有关，因为上次是伯达点的吴传启的名，非他出来给吴传启平反不可。”² 陈伯达贬低吴传启的另一个效果是留给人们一种想象：既然吴传启是一个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的小人物，为什么又那么神通广大呢？后边是不是有大人物呢？吴传启“不值一提”，值得一提的是不是后边的某个大人物呢？

陈伯达的 6.5 讲话，本来是要压一下北大，不料把事情闹大了，事情如何收场，既由不得陈伯达，更由不得关锋和戚本禹了。不久，随着关锋、王力悄然倒台，经营了一年多一点的阴谋团伙顷刻瓦解。潘、吴、林的逃亡生活也没有能像关锋、戚本禹设想的那样持续半年一年，当年 9 月份就被抓回来了。

¹ 红卫兵总队 831 兵团：《篡党窃国野心家戚本禹扶植潘吴集团罪行》，载学部红卫兵总队等编辑出版：《长城》第七期，1968 年 2 月 27 日。

² 红卫兵总队 831 兵团：《篡党窃国野心家戚本禹扶植潘吴集团罪行》，载学部红卫兵总队等编辑出版：《长城》第七期，1968 年 2 月 27 日。



图二 1967年8月31日出版的《新北大报》、《新人大》合刊

第二个问题，就是《常文》借口聂、孙举报关锋、王力的事情当时没有传达过，“在北大现有的报刊和档案中也都没有记载”，来为《北京大学纪事》的相关作者辩护。

这也是一种狡辩。《北京大学纪事》的相关编者，拥有丰富的资源，并不是真的不了解情况；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了解不了解的问题，而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是愿意不愿意承认的问题。他们的态度，和《常文》作者的态度是一样的。《常文》不是至今仍然宁可写一些自相矛盾的文字，也不肯承认历史事实吗？

上文已经讲过，1967年4月10日江青关于吴传启问题的表态，特别是“在政治上要和吴传启划清界线”一句，新北大公社中有许多人是知道的。现举二例。

《记忆》第139期所刊《我所了解的孙蓬一》一文，摘录了孙蓬一1977年1月3日写的一封信中的回忆：“四月十日回来以后，聂与我向校内一些人转达了接见的大致情况。”信中说的“校内一些人”，应该包括校文革常委，以及宋一秀、李清昆等人。在校内领导层的传达是及时的。

《记忆》第132期所刊《扬子浪日记》，1967年4月14日那天记的是：

4月14日

昨晚谢富治同志接见地质、北大，搞了些误会，孙蓬一讲话竟然大发政治牢骚炮轰起谢富治来了。昨晚几千人集合准备去冲击公安部，找谢富治同志评论(应为辩论或评理——引者)。亏聂元梓阻挠才未得逞，避免了一场大祸。

听小广东告诉我，宋一秀对他讲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在四月十日单独接见了聂元梓、孙蓬一同志，江青同志说过，对吴传启至少要在政治上划清界线，不知是真是假？

扬子浪的日记证明，他至迟在4月14日就听到了这句话，这说明传播速度是相当快的，而消息源于宋一秀，¹ 其真实性毋庸置疑。

即便这句话没有公开传达，但孙蓬一4.12讲话，已经把当时的形势和北大面临的种种困惑的原因讲得很清楚了。讲话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聂、孙4月10日对陈伯达、江青讲的内容，只不过4.12讲话没有公开点关锋、王力的名而已。讲话中提到的事情，有一些就是北大同学亲身经历过的。广大师生是相信事实的，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认知是坚定而不可动摇的。

这句话也传播到许多反对吴传启的群众组织那里，现举一例。

学部红卫兵总队等编辑出版的《长城》第5期（1968年2月19日）发表了《关王庙的退却和付崇兰的“造反”》一文，其开始部分写道：“67年4月，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了向关王庙进军的战斗号令。”（图三）《长城》第7期（1968年2月27日）发表的《篡党窃国野心家戚本禹扶植潘吴集团罪行》一文也提到了江青的指示，要在政治上同吴传启、潘梓年划清界限。这都证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学部红卫兵总队早已知道了4月10日江青有关讲话的内容。

¹ 宋一秀，北大哲学系教员，“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之一。



图三 《长城》第5期

聂元梓、孙蓬一的历史局限性是当时对戚本禹还缺乏认识。4月10日聂元梓、孙蓬一和陈伯达、江青谈话时，他们不同意关锋、王力参加，但同意戚本禹参加了。这次谈话无密可保，因为戚本禹会在第一时间向他的同伙通风报信。所以，即便孙蓬一4月12日没有发表那篇演讲，关锋、王力和吴传启一伙也会立即受到惊动。现在回顾历史，聂元梓、孙蓬一的历史局限性更表现在他们对于反吴传启及其后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和艰巨性严重缺乏认识，他们向陈伯达、江青举报，却不知这个问题不是陈伯达、江青解决得了的，何况江青本人当时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感觉。这是一个要毛泽东发话才能解决的问题，

但聂元梓、孙蓬一的认识远没有达到这一步。

关锋一伙首先要否认和掩盖这件事情。1967年10月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编写的《斩断林杰反革命集团伸进新北大的黑手》一文第7页提到，“周景芳看了江青4.10关于与潘、吴划清界限的讲话以后，就别有用心地说：‘这不是江青同志讲的，是聂元梓说的。’”林聿时则说：这是“造谣”，“不知聂元梓怎么反映情况的”。

但这件事情是真的，所以，关锋一伙很快采取了“收缩”的方针，隐蔽自己，以图对抗。卢正义失踪，吴传启等人逃往外地躲藏，都是“收缩”的一部分。有些大报曾大量刊登学部联队的“大批判”文章，为吴传启一伙制造舆论，但现在不敢再用“学部联队”的署名了，而要改用笔名。一些批判大会的海报上，“学部联队”也不再排在发起单位名单的第一位了。戚本禹则在学部另外支持一派，也开始反潘、吴的行动，以争取主动权。与此同时，他们千方百计地压制北大，特别是要阻止北大揭露吴传启的行动。他们明里召见聂元梓，威胁利诱，暗里在北大寻找代理人，在内部搞分裂，以便把北大搞乱，先让聂元梓后方着火，再把聂元梓打倒。由于聂元梓不肯妥协，于是有了陈伯达的6.5讲话，点了一把大火。

关锋、戚本禹、王力等人，利用文革大乱的机会，纠集了一帮自己的势力，这股势力有一群人，他们打着“中央文革”的旗号，披着“革命左派”的外衣，上下左右勾结在一起，兴风作浪，能量极大。要动其中的某一个人，就等于动一大群人，冒犯了其中某一个人，哪怕无意中冒犯了他们的某一个角落，就会有一群人扑上来。反对他们的人，稍有不慎，就会把自己搭进去。聂元梓、孙蓬一对这个团伙虽然有所认识(这在当时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对这场斗争将面临的阻力和艰巨性、复杂性，认识和心理准备远远不够，准备不足，策略不当，最后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四、孙蓬一 4.12 讲话的矛头指向谁

笔者在《三件大事》一文中明确指出：《北京大学纪事》对孙蓬一 4.12 讲话的矛头指向作了歪曲记载，并讲述了由孙蓬一 4 月 13 日讲话引发的“炮打谢富治”事件。¹ “炮打谢富治”事件发生的时间是 1967 年 4 月 13 日，因为谢富治后来被否定了，所以《北京大学纪事》的编者刻意回避这件事情，这一天的记载是空白的。关于这两件事情，《常文》是这样写的：

4 月 12 日晚上，校文革在大饭厅召集大会，参加人数很多，气氛十分火爆，笔者也在现场听到了孙蓬一声嘶力竭的讲话，他在说到当前形势时如临大敌，认为有人要推翻他们这个“红色政权”，矛头直接指向了地院东方红等组织，也暗示地院的后边有人支持，在他的非常具有煽动性的讲话后，部分群众走出校门游行，并贴出了针对谢富治的大标语。

尽管作者声称他 4 月 12 日晚在现场听了孙蓬一的讲话，但《常文》这段话表明，作者对 1967 年 4 月上中旬在北大发生的事情并不真正了解，因而根本没有听懂孙蓬一的讲话。作者一再声称不知道什么吴传启，而孙蓬一这次讲话的重点就是吴传启。孙蓬一指出有一种现象：“反对吴传启就像犯了弥天大罪”，孙蓬一说：“我今天就要公开表示，我们就是反对一下吴传启”，“吴传启到底是一个什么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他不是什么响当当的左派，而是一个在政治上值得大加审查的人。”孙蓬一讲话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揭露吴传启、卢正义、洪涛、刘郢一伙的，他明确指出：“在我看来，这一股势力的代表，这一股势力的核心不在学校，而是一些机关，是真正的摘桃派，那是一些什么人？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如高教部的延安公社、中央统战部红色联络站。”请问《常文》的作者，这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地质东方红”吗？

《常文》说孙蓬一的讲话“也暗示地院的后边有人支持”，在 4.8 民族宫事件上，地院的后边确实有人支持，如洪涛之流，不过洪涛已经被点名了，还有什么必要“暗示”呢？

¹ 参见《记忆》143 期第 31—39 页。

孙蓬一讲话所“暗示”的，所要揭示的，不是“地院的后边”，而是吴传启一伙的后台，实际上是关锋和戚本禹。

孙蓬一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而这样一种力量，采取一种非常不正当的手段，采取拉一伙，打一伙，拉拉扯扯，勾勾搭搭，招摇撞骗，把手伸得很长很长，真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当他们跟别人辩论，他们提不出充足证据的时候，便拿出所谓的王牌，说：某某支持我们。不管什么人，只要你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他支持了你，那么他也是错误的。”明眼人都知道，孙蓬一的这一段讲话，暗示的就是关锋。所谓“某某”，就是关锋。后来揭发出来的材料表明，有许多事情，实际上是戚本禹干的，或者是关、戚合伙干的，所以，孙蓬一的矛头所向，实际上也包括了戚本禹，但这只有戚本禹自己明白。

孙蓬一还提到了 1.15 抢档案事件：“……抢档案的人成了革命派，而制止抢档案的人却成了反革命。红卫兵总部的郑仲兵同志被关到监狱十五天。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不问一问，绝对不能做奴隶主义，绝对不能盲从。” 1.15 抢档案事件发生后，一开始洪涛、刘郢等人被公安部逮捕审查，但过了一天就被释放了。民间调查显示，幕后起作用的，正是吴传启—关锋这条线。据说这天晚上吴传启一夜未睡，守着两部电话，看洪涛、刘郢出来了没有。有知情者说：“刘郢、洪涛是通过吴传启、穆欣、关锋（出来的），是关锋打电话叫公安部放的。”洪涛、刘郢被释放后，声称谢富治接见了他们，谢向他们表示慰问，还说“公安部要发表声明”，而且由洪涛“亲自写”，等等。于是，1月17日，就有了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发的《公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¹ 1.15 事件要追问下去，就会追到关锋、谢富治头上，关、谢都难辞其咎。

孙蓬一还提到了周景芳，否认了“周景芳是中央文革成员”的谣传。周景芳自称是“中央文革的代表”，聂、孙 4 月 10 日曾当面向陈伯达、江青求证，江青予以否认。其实，

¹ 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社“独立寒秋”战斗队：《首都高校两派矛盾的由来、发展和关锋、王力有关讲话》，1967年9月，油印本。

周景芳是戚本禹的代表，是戚本禹伸向北京市革委会的“黑手”。孙蓬一的讲话，矛头实际上指向了戚本禹。

总之，孙蓬一的 4.12 讲话，其矛头所向，并非“地质东方红”，而是吴传启团伙和他们的后台关锋、戚本禹，还有谢富治。后来揭发出来的事实，证明孙蓬一讲话指出的这些人都是有问题的，而事情的严重性，比孙蓬一 4.12 所讲的，还要严重得多。

《常文》还把孙蓬一 4.12 和 4.13 两次讲话混为一谈，说明作者的记忆完全是混乱的。作者当时是否在学校里，是否真的听过孙蓬一那两次讲话，都应该打一个问号。笔者再说一次：1967年4月12日晚孙蓬一在全校大会上公开向吴传启们宣战（讲话全文见附件3）；4月13日晚，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来北大声援，因为对谢富治当天不能公正地处理地质和北大的矛盾这件事上有意见，孙蓬一的即兴发言引发了“炮打谢富治”事件。

五、关于《北京大学纪事》

《常文》说：对于这部记述了北大百年历史的长达 1352 页的巨作，胡宗式并不见得全部读过，他只是对其中记述文化革命的部分十分不满，挑出几个地方进行责问，这才真正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按《常文》的说法，不把这部 200 万字的书读完就提意见，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了。这是什么逻辑？《常文》的作者也并未声明他们看完了全部一百年的《纪事》的内容，不也在为《纪事》进行辩护吗？像《纪事》这种面向公众的历史资料性的工具书，当然要接受公众的检验、考证和指误，并在纠错中不断改进和完善。任何人，哪怕只看了某一日、某一条，只要发现有错，都有权予以指出。不许批评、指正，不是科学的态度，而且是不负责任的。

对史书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历史事实。《北京大学纪事》作为一种历史工具书，对资料的选择应全面、客观，尤其不可做有倾向性的选择和取舍。因此，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工

作。但遗憾的是，至少就文革头两年的记载来看，虽然也收入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但对某些重要事件的记载是不准确的，甚至是严重失实的。工作中的疏忽和资料缺失是难免的、正常的，人们不应苛责。但我们看到的，不是疏忽大意或资料缺失的问题，而是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纪事》的编写者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或者囿于其个人的政治立场和情感因素，并未能做到客观和公正这两条基本的原则。这一部分《纪事》采录的材料是有倾向性的，有选择性的，是有偏见的。《纪事》的这一部分欺骗不了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但容易误导后人。但后人也不是好糊弄的，像《纪事》编者所用的那些手法，并不难被发现。那些有意为之的误导，很容易被发现，并受到质疑。《纪事》的整体价值，将会因为其中两年的缺陷，而受到严重影响。毕竟，历史是要由后人来评说的。历史，也是由后人来写的。

《北京大学纪事》涉及北大一百年的历史，编者们无疑付出了许多辛勤劳动。笔者在北大只待了十年，自然没有资格对全书进行评价，笔者也无意于此。但笔者毕竟在北大生活过，特别是亲身经历了文革的头两年。笔者在回顾北大文革历史的时候，自然要看看这部《纪事》。

《纪事》文革部分的主编，是长期在北大工作的老干部，是北大文革的亲历者。他们是受害者，也是参与者。他们的思想，有着文革前与文革中各种矛盾斗争的烙印。作为个人，任何人都有权利保留自己的观点，那怕是偏见。但作为史料的编撰者，就应该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摒弃一切有损客观、公正的偏见。但他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于是，北大的文革就变成了一场反聂和保聂之争。

《纪事》关于文革的记载，不少内容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有些问题，笔者已在《17日还是19日？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北京大学纪事〉作者造假又一实例》（载《记忆》第133期），以及《从三件大事的记载看〈北京大学纪事〉》（载《记忆》第143期）等文章中作了讨论。《纪事》的编者，还有一种“恶之者增其罪”的做法。据章铎女士抄录的《〈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中的聂元梓和孙蓬一》（载《记忆》第133期），与1998年

版相比，2008年再版的《北京大学纪事》，就增加了27处给聂元梓等人“加罪”的内容，特别是增加了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所谓反对周总理的内容，其材料来源基本上是清查“五一六”时期的“交代材料”，而且在选用时又采取了歪曲和剪裁的做法。

笔者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北京大学记事》2008年版，第777页这样写道：

6月 “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胡宗式称：“1967年初，曾加入‘湘江风雷’并任挺进支队北京支队负责人的许××，要我们把陷害总理的‘007密令’通过聂元梓，直接转到中央文革。我请示了聂元梓，她说：你们把它送到中央文革记者那里。由聂元梓电话联系，我到44楼三楼，向中央文革记者上交了这份材料。”

这里的记载，和我当时写的材料有着本质的区别。在1971年清查“五一六”时，我是这样写的：

1967年初，……在支持“二筹”的活动中，动态组的刘志菊和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的许维纲相识。1967年中央下达“二·四批示”，把“湘江风雷”定为反动组织。“湘江风雷”的头头认为，“二·四批示”是总理因“007密令”问题，对“湘江风雷”实施报复，于是通过不同的渠道向中央文革送材料。许维纲曾加入“湘江风雷”并任北京支队队长。他想把所谓的“007密令”的材料，通过聂元梓直接转到中央文革。经刘志菊介绍，1967年4月许维纲来到北大，把材料交给了我，我看后把这份材料交给聂元梓。第二天聂对我说：“反总理是不对的，这份材料我不给转。你把它交给新华社驻北大的记者（实际是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你到44楼3楼，我先打个电话。”我在转交材料时写了一个附言，说明了许维纲的身份并且写了我的看法：“这是对总理的政治陷害”。

很明显，《记事》的编者，在引用我的材料时故意删去“聂元梓说：反总理是不对的，

这份材料我不给转”，和我的看法“这是对总理的政治陷害”这些关键的话。这种手段，哪里有什么客观和公正呢？

再举一个与高云鹏先生有关的例子。《北京大学纪事》记载：

（1968年）3月28日 经校文革武斗指挥部高云鹏等策划，聂元梓决定，新北大公社攻占两派共同居住的31楼，将住在此楼的井冈山兵团成员赶走。双方发生武斗。高云鹏说：“这一仗打出了新北大公社的威风”。

这段记载与事实不符：（1）北大第一次大规模的武斗发生在3月29日的凌晨，并非28日；（2）高云鹏当时是哲学系文革主任。校文革并没有武斗指挥部，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部也是另有其人。说高云鹏策划这件事，以及“高云鹏说：这一仗打出了新北大公社的威风”，完全是无中生有。

北大3.29武斗事件发生后，聂元梓让高云鹏到44楼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把把关：“别让年青人做出出格的事来”。对于北大长达数月的武斗，双方都有责任，而在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方面，负主要责任的是孙蓬一。刊登在《记忆》第139期上的《孙蓬一的检查及工宣队的批语》这份资料中，孙蓬一对北大武斗已经承担了责任。在《北京大学纪事》问世之前，孙蓬一已经去世了。《纪事》的编者，就找出高云鹏来代替孙蓬一，把北大武斗的责任推到高云鹏身上。《纪事》中关于高云鹏的多条记载，都与事实相距甚远。1970年后，高云鹏因不愿作伪证去陷害聂元梓，遭到迟群之流的陷害，差点丧命。好在高云鹏健在，使我们得以知道事件的经过。

我们指出《北京大学纪事》中的一些问题，只是为了对北大的这段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我们和《纪事》的编者，至少在文革的头两年中，都是北大文革的亲历者。在历史事实面前，我们是平等的。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事实搞清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总结文革给我们民族带来的惨烈教训，才能以史为鉴。■

附录一

聂孙之流就是不折不扣的“二月逆流派”

1864 支队

(载《新北大报》1968年3月22日第二版转第三版)

最近，从无产阶级司令部传来了迎头痛击“二月逆流”新反扑的战斗号令。三月十一日接见会上，中央首长指出：“二月逆流”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必须予以迎头痛击。三月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代表时，江青同志又尖锐地指出：“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北京有学生要为‘二月逆流’翻案。”来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擦亮了我們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眼睛，使我们找到了运动的症结所在，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了。北大的问题难道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吗？不，它是全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一个缩影。

(一) 二月逆流在新形势下的反扑

阶级斗争的现实教育我们：“越接近全面胜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越是尖锐，越是激烈”。在当前，正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总结一年多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实现革命大联合，斗私批修，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时候，被打倒的走资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预感到本阶级灭顶之灾的来临，按捺不住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刻骨仇恨，终于又一次跳了出来，蒙蔽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以极右的面目出现，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残酷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去年的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翻案。这是一股极为反动的社会思潮，是“二月逆流”在新的形势下的反扑，是阶级敌人临近灭亡前的回光返照。在这股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中，聂孙之流充当了什么角色呢？他们猖獗一时的反动气焰，证明了聂孙之流就是这股反动的极右势力在北大的代表人物。但是正象毛主席所

说的当他们处于不利的情况的时候，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当我井冈山人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号召，奋起反击聂孙之流掀起的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妖风时，他们慌了手脚，一面往自己脸上胡乱涂些油彩，高叫什么“我们没有为二月逆流翻案”呀，什么“我们是反击二月逆流的英雄”呀，一面贼喊捉贼，恶人先告状，说我井冈山人是为二月逆流翻案。那么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人，在事实面前，这伙丑类必将原形毕露。

(1) 二月十五日在聂元梓的北大小报上，他们把反击“二月逆流”打成“关王林反党集团的阴谋。”受到了中央首长的严肃批评。

(2) 三月七日晚上，北大公社总部主持在办公楼礼堂召开了一个形势串联会，在这个串联会上，他们公然把去年反击“二月逆流”革命行动打成“湖南省无联”的反动政治纲领，他们咒骂“井冈山兵团至今还坚持反击二月逆流的主流是好的，不承认反二月逆流要害是炮打周总理”，他们把一张认为“反二月逆流大方向正确，阶级敌人的利用是支流”的大字报打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大字报”。还是在这个会上，他们极力标榜自己是为保陈毅、余秋里而作了英勇斗争的“英雄”。

在红旗兵团一个战斗队的一张没有来得及发表的大字报上，有这么一段话（大意）：在一月夺权之后，有一伙特务、叛徒……打着所谓反二月逆流的旗号，蒙蔽了一部分群众，猖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反对谭震林等“老革命”。

在北大校内，聂孙之流向井冈山兵团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猖狂进攻，妄图把在反击二月逆流斗争中英勇冲杀出来的井冈山兵团打成“反动组织”，在校外，把那些在反击二月逆流时站在二月逆流方面或者对二月逆流态度暧昧的势力，纷纷向在反击二月逆流冲杀出来的革命造反派发起反攻倒算，妄图把他们通通打成“关王林的私生子”，进而加以摧垮。

在××学院，以保余秋里同志错误著称的××公社，妄图否定在反二月逆流中作了很好贡献的北京公社；在师大，造反兵团妄图搞垮在反二月逆流中打头炮的师大井冈山和

师大革委会；在民院，抗大公社借洪涛、刘郢¹问题妄图搞垮反二月逆流的东方红公社；在农大，保谭势力蠢蠢欲动，妄图借秦化农²问题全盘否定在反二月逆流中一直顽强战斗的农大东方红和农大革委会；轻工红鹰也以自己过去保陈毅保余秋里为理由，要求给自己记一大功；在外交部，出现了一张为二月逆流翻案，向革命造反派反攻倒算的“九十一人大字报”等等、等等。

在这同时，那些妄图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人还一致把矛头指向了以谢副总理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北京卫戍区。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只要我们把这些事综合起来，加以分析研究，就可以发现，这是一股以聂元梓、孙蓬一出面指挥，以石油大庆公社、民院抗大公社、师大造反兵团为急先锋的一股为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翻案的妖风，是二月逆流在新形势下的反扑。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前这一场斗争的阶级实质，我们不妨翻一翻他们的历史，就可以更加证实“聂孙之流是不折不扣的二月逆流派”的结论。

（二）历史的回顾

（1）聂孙之流在二月逆流中的表演

去年一月夺权之后，那些以谭震林为代表的被打倒了的党内走资派伙同社会上牛鬼蛇神，为了恢复自己失去了的“天堂”，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有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同志也卷入了这股逆流。

在二月逆流中，聂元梓伙同坏人孙蓬一同样扮演了十分可耻的角色。在校内他们耍弄了无耻的资产阶级政客手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残酷地镇压同陆平黑帮，张承先坏工作组和王任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英勇斗争的广大革命造反派，向革命造反派实行疯狂的反攻倒算。在校外，到处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在农口，他们支持保谭派；

¹ 刘郢、洪涛是1967年1月15日抢劫统战部、政协档案的主谋，关锋、王力垮台后被逮捕。

² 秦化龙，时任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代主任，群众曾揭发他的叛徒问题。

镇压造反派；他们公社成立后的第一次社员大会，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谭大会¹；在农大，他们支持农大红旗，镇压东方红；在华北局，他们支持李立三反党集团，镇压华北局革命派；在广州，他们的《新北大》广州版发表了一篇大毒草《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成为广州市保守势力向革命造反派反攻倒算的号召书，被中央文革小组点名批判；在湖南，他们伙同湖南老保，疯狂镇压湘江风雷，他们参与了查封首都三司驻长沙联络站的武斗，把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驻长沙联络站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直到七月份中央已准备为湘江风雷翻案，北大公社总部还发表声明说长高司是革命小将，湘江风雷不能翻案；在武汉，他们伙同走资派，把武汉三钢打成反动组织；在山西，他们勾结刘志兰反党集团大反刘格平；在天津……，等等，等等。

(2) 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期聂孙的表演

三月七日，师大井冈山公社打响了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炮，这一炮打得准，打得好。它得到了中央文革和谢副总理的坚决支持，也得到了全市革命造反派的热烈响应。

正当社会上轰轰烈烈地反击二月逆流的时候，北大正沉醉于围攻郭罗基同志大字报的热潮中。直到3月12日战斗团团务会议上，他们还说什么“现在打倒谭震林不保险，打李雪峰最保险”。同一天聂元梓在红代会核心组会上提出要打倒李雪峰，遭到大家拒绝，但她还不死心，于四月四日又以公社总部名义发表了个声明，把李雪峰同志打成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公开为二月逆流的真正急先锋谭震林开脱罪责。五月份，聂元梓竟狗胆包天，伪造最高指示，死保谭震林，陷害王震。这时，以原新北大公社02团和16团（即现在的井冈山02、16纵）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为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奋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炮轰谭震林时，公社总部头头打电话给二团，厉声问道：“你们为什么轰？无组织、无纪律，有没有公社总部？你们以什么名义轰的？”当02同志说明不以公社名义轰，以战斗队名义轰，有责任自己当时，公社总部头头说：

¹ 指新北大公社在北师大“井冈山”提出“打倒谭震林”之后在大饭厅召开的一次情况介绍会，时间在1967年3月10日左右，笔者在这次会议上介绍当时所了解到的情况。

“北大地位特殊，你们以战斗队的名义，别人也说北大表态了，都找上门来怎么办？”

另一方面，公社总部还派了他们动态组的王××到农口调查，这个王××一到农口，就一头扎进老保组织——农业部延安战斗团，伪临管会，反革命分子江一真，修正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左叶，大叛徒李夫（皆保谭派）怀里。全盘接受了他们的观点。

当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时，迫于形势的压力，新北大公社总部才被迫于3月14日发表了一个声明，被迫同意02团、16团参加一些活动。况且，当时参加农口支持造反派的活动都是02团和16团的同志参加，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北大“正统造反派”支持农口“斗斗批”，“非正统造反派”支持农口联络站。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也还没有放弃原来的立场，还继续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顽固地站在二月逆流派那一边。

请看下面的事实：在校内，孙蓬一扬言，反谭震林的不一定是造反派，保谭震林的不一定是保守派，大讲大叛徒谭震林光荣的四十年历史，并在谭的授意下，大反许世友同志。继续对高举革命造反大旗的原新北大公社02团和16团实行反攻倒算，残酷镇压，这也是后来16团全体起义，02团几乎全团起义，奔上井冈山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笑的是，新北大公社总部向中央汇报的一份材料中，竟然说什么在反击二月逆流中，他们是委托新北大公社红二团、红十六团派人参加批谭联络站的工作和支持农口被压制的革命派。可爱的先生们，我英雄的02团和16团同二月逆流英勇斗争的时候，你们“红二团”和“红十六团”（即十六糟团）还没有成胎呢！而在校外，孙蓬一之流赤膊上阵，疯狂炮打谢副总理。因谢副总理在反击二月逆流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支持了革命造反派，故被谭震林之流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孙蓬一之流炮打谢副总理的逆流正好适应了谭震林们的需要。于是谭就在四月二十四日受北大公社总部的邀请，派得力干将江一真到北大来谈判，双方一致认为：谭震林打不倒。北大公社方面并认为：对社会上搞谭震林、余秋里、陈毅都有些思想不通。他们对农口、对北京市的文化革命形势都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最后双方还达成协议，共同揪叛徒（江一真所谓揪叛徒主要目的在于借此从造反派中揪出几个

坏人从而否定造反派)建立“内部动态”联系,让江一真派人每隔两天去拿一次“内部动态”。谭震林对农口“斗斗批”的第二号头目钱轶芳说:“要和北大联系,把希望寄托在北大”。在孙蓬一炮打谢副总理时,农口老保到处贴大字报、大标语“坚决支持新北大公社的革命行动”,并居然耀武扬威地打着大旗到北大来参加了几次大会。同时,新北大公社竟然在大街上刷大标语要“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受到了陈伯达同志的严厉批评。此后,社会上那些“拥护二月逆流派”就纷纷向北大靠拢,(如大庆公社,民院抗大,轻工红鹰,农口老保等,充当了孙蓬一炮打谢副总理的马前卒),而那些反击二月逆流派(如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地院东方红,民院东方红等)就渐渐地成了聂孙之流的眼中钉。

(3) 九月师大事件中聂孙之流的表演

八月底,中央文革清除了几个钻进来的坏人,即揪出了关王林反党集团,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中央文革一再指出,这是中央自己揪出来的,不要把关王林问题抛到社会上去,以防坏人钻空子。但是那些热衷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人,那里把中央首长的指示放在眼里?聂孙以为这下子可捞到了一根稻草。于是他们就把反击二月逆流打成“关王威林的阴谋”,借机为二月逆流翻案。他们乘机把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打响了第一炮的师大井冈山及师大革委会打成“反革命”,进而把它搞垮,以实现他们为二月逆流翻案的罪恶阴谋。在这个事件中一贯保二月逆流的石油大庆公社和坏人孙蓬一之流都做了充分的表演,校文革副主任姜同光率领人马亲临前线督战¹,而在市革委会通过师大事件的通告时,只有聂元梓投反对票²,妄图搞垮师大革委会。在这次事件中,农口老保更是欢天喜地。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一眼看穿了这些“二月逆流派”狼子野心,九月七日,中央文革发出了紧急通知: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二三月份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市革委会及时地对“专政委员会”采取了果断措施,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保卫了年轻的师大革委会。此后,聂元梓等人

¹ 对于1967年9月7日北师大的会议,新北大公社总部事前指示:各单位不得参加。此文说姜同光率队参加,纯属谣言。

² 1967年9月7日上午发生揪斗谭厚兰事件,下午中央就表态,还抓了人。这是最高当局的行动,通告只是借助市革委会的名义发表而已。聂元梓当时在学校和客人谈话,并未参加什么会议,说聂元梓投反对票,也是谣言。

又一次受到了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并叫他们检查交待自己的后台。

总理：北京两大派，对师大，就要找借口，要把人家颠覆掉，内部有人，外部还有一伙人去煽动。……

伯达：你们一定要吃掉对方，对北师大就一定要吃掉人家，……大鱼吃小鱼。

江青：大鱼吃小鱼，北大聂元梓也去了。

（聂：没去，我们在家召开形势座谈会。）

江青：总之，你们是幸灾乐祸吧？……

九月师大事件是二月逆流新反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阶级敌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聂孙的阴谋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沉重打击下，终于可耻的失败了。

（三） 结束语

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这些人中的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在当前，正当中央文革揪出了反革命两面派戚本禹时，正当无产阶级革命派总结一年来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围剿派性，斩断黑手，实行革命大联合时，聂孙“拥护二月逆流派”又以为有稻草可捞了。一方面他们预感到革命大联合的实现，就是他们末日的来临，因此，聂孙就拼命破坏大联合，破坏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攻击解放军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另一方面，聂孙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借造反派围剿派性，作自我批评的机会，全盘否定革命造反派，进而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借中央揪出反革命两面派戚本禹的机会，大做文章，扬言要打倒谢富治，妄图搞垮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二月逆流翻案，以实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这是反革命行为！

但是，这些比驴还要蠢的先生们想错了。正当聂孙在做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疯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时候，无产阶级司令部向我们发出了迎头痛击二月逆流新反扑的战斗动员令，宣判了阶级敌人猖狂反扑的死刑！无产阶级革命派闻风而动，奋起痛击二月

逆流的猖狂反扑，把阶级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焦头烂额，真是大快人心，人心大快！再回过头来，我们只要（1）把今年三月分发生的师大事件同去年九月的师大事件联系起来，再同师大井冈山在反击二月逆流斗争表现联系起来；（2）把今年三月发生的炮打谢副总理事件同去年四月炮打谢副总理事件联系起来，再同谢副总理在二月逆流斗争中的鲜明立场联系起来；（3）把聂元梓在当前的表演同去年九月份的性能，再同去年四月分的表演以及反击二月逆流时期的表演联系起来看，那么，当前这场斗争的阶级实质不是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了吗？

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让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穷追猛打，把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彻底打垮。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打倒谭震林，揪出小爬虫孙蓬一！■

附录二

三十五个为什么？¹

《多思》战斗队

- 1、为什么8月11日江青同志谈到有人分裂中央文革时说：“我觉得这里面有只黑手！”而且这只黑手“不但伸进革命小将里面”，还想打中央文革的主意？这只黑手究竟是谁？
- 2、为什么8月11日江青同意在分析全国形势时，三次谈到北大，并强调说：“对聂元梓同志，我没有私交。在去年大字报以前，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位同志”，“大字报出来时才知道有这么一位同志，接触也不多。”“她对的，我们全组都支持；不对的，我们就不支持”？

¹ 载新北大井冈山兵团编辑出版：《新北大报》，第七号第三版，1967年8月25日。

联系到聂元梓向来吹嘘为“江青派”，“和江青有单线联系”又说明什么问题？江青同志这样强调为什么？

- 3、为什么反动思潮的代表人物朱成昭说：“我们和聂元梓打着打着会打到一块去”？为什么朱成昭表示同意聂元梓在“5.16通知”公开发表后对形势的估计？而这种估计恰恰是人民日报所批判的？
- 4、为什么大左派，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聂元梓每当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一个关键时刻，都起着破坏主席战略部署的恶劣作用？
- 5、为什么去年10月正当全国进入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高潮时，聂元梓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来混淆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
- 6、为什么在“一月风暴”之后的夺权斗争中，在山西、山东、上海、贵州、黑龙江、北京六省市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时，聂元梓提出“念念不忘一个权字”和“摘桃派”的理论，来破坏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斗争和动摇无产阶级专政？
- 7、为什么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前夕、聂元梓、孙蓬一煽动数千群众炮打谢副总理？为什么与此同时北大出现了炮打、影射关锋、林杰的大字报？
- 8、为什么北大的一个普通校刊编辑吴子勇能绘出触目惊心的反革命“四月形势图”？在反革命“四月形势图”中列出了一股来自中央文革，另一股来自中央军委的所谓的“反新北大逆流”这又说明了什么？
- 9、为什么当伟大的历史文件“5.16通知”公开发表后，聂元梓提出“这是新的文化革命开始”和“二次革命论”，扬言要从中央揪出新的黑线黑帮，要把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揪出来？康老8月11日讲“有人用资产阶级一套窥测5.16通知发表的意义”，这是什么意思？
- 10、为什么聂元梓讲“十七年来掌权经验不能用了”？又为什么在首长讲话以后，聂孙对抗中央精神，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传5.25大字报，根本不提江青同志支持的座谈纪要，为什么他贬低5.16通知的伟大意义？

- 11、 为什么在陈再道跳出前夕、军内两条路线斗争十分尖锐的形势下,聂元梓的嫡系“炮兵营”大肆鼓吹,一论再论要“大树特树解放军的绝对权威”?
- 12、 为什么今年8月大批判进入高潮时,新北大公社抛出了所谓的刘少奇的第二份检查来制造混乱?是什么人传言“八.五革委会要把刘少奇揪出来斗”?为什么北大七月二十四日到(斗?原文如此——抄录者注)彭真的大会上给彭斌提供讲台,竟给彭斌二分之一的时间任其放毒?
- 13、 聂、孙在北京大搞微不足道的人物吴传启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为什么陈伯达同志说:“以为利用吴,一下子打中了,可以把报纸中央的权夺过来了”?
- 14、 为什么聂元梓“6.4”讲话中说:“新市委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批判彭真、革委会成立两个月未批彭真……”这是什么意思?
- 15、 为什么聂、孙之流攻击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为什么在北大多次出现围攻红旗杂志记者的反常现象?
- 16、 为什么聂元梓公开指使人批判《红旗》杂志第七期评论员文章“抓住主要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 17、 为什么陈伯达同志“六.五”讲话中批评聂孙是“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关锋、王力二月四日对聂孙的批评说明了什么?
- 18、 将“人民日报”“红旗”的“六一”社论,伯达同志“六.三”,“六.五”讲话,《红旗》第七期评论员文章,《红旗》第十期社论联系起来和北大运动对照地看,说明了什么问题?
- 19、 为什么聂元梓一定要打倒李雪峰、徐非光、刘郅、洪涛?她为什么对华北局,高教部、民委统战系统这么感兴趣、花力气?
- 20、 为什么聂元梓在华北局勾结聂元素(其姐)梁寒冰(姐夫)支持保守组织——联总大反李雪峰?为什么中央派李雪峰到天津工作后,聂元梓还派人追到天津去大反李雪峰?为什么天津来人在北大贴大标语“支持聂元梓,就是打倒李雪峰”?

- 21、 为什么去年八·一五斗陆平大会，中央文革都不知道，李立三却上了主席台？是谁请他上台？他凭什么资格上台？
- 22、 为什么聂元梓勾结山西反党集团成员刘志兰大反李雪峰？
- 23、 为什么北大顽固地支持长高司、镇压湘江风雷？为什么北大在四川支持老产后又支持“红成”？在武汉把钢工总打成反革命，后又支持康老三（三司）？在广州写“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 24、 为什么聂元梓在二月资本主义逆流中在工交口，农口和全国许多地方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
- 25、 为什么7.15谢副总理、王力在武汉和造反派游行、陈伯达和戚本禹同志在北京讲话，而同一天聂元梓在石家庄讲话镇压造反派？为什么伯达和谢副总理都不同意新北大公社参加河北问题调查组？
- 26、 为什么在湘江风雷平反后代第二天，聂元梓亲自去民院抗大，她去后，民族学院产生武斗？为什么新北大公社“冲锋号”加入民院抗大后，民院武斗日益加剧？
- 27、 为什么北京工商管理专科学校、民院等武斗最厉害的学校都与北大关系密切？前几天北大大规模武斗和北京形势关（原文如此——抄录者注）系起来说明了什么？
- 28、 为什么伯达六·三批评北大之后，六·四聂元梓贴出所谓“第三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全盘否定伯达讲话？
- 29、 为什么伯达六五讲话后，聂元梓在全校大会上说：“对伯达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得执行”？这句话含义是什么？
- 30、 为什么5.23日在人大大会堂有林彪副统帅出席的纪念毛主席的“讲话”25周年大会上，伯达、戚本禹同志讲到文化大革命几个重大关键时，不提5.25大字报？
- 31、 为什么谢副总理8月13日的讲话中只说“地院、师大、北航、清华是革命派，你们是革命小将，我不愿意怀疑你们”而不提新北大？
- 32、 为什么聂元梓说抄吴溉之的家比“五·二五”大字报意义还不（原文如此——抄录

者)大,而江青同志却不知道聂元梓的丈夫是谁?

- 33、徐运扑同志揭发聂孙怀疑总理说明了什么?为什么一月出现反康逆流时,聂元梓态度暧昧?
- 34、为什么陶铸、王任重长期控制北大运动,聂元梓和陶、王尤其是和王任重接触最多,为什么从不揭发?为什么陶铸去年12月30日分明已揪了出来,而去年12月30日偏偏还用陶铸的名义派红卫兵大抄她丈夫吴溉之的家?
- 35、为什么聂元梓胡说其父母是革命地主,而在其姐聂元素华北局处长,其哥聂真(社会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逃跑后、聂元梓搬家,并把其地主母亲接到北大来? ■

附录三

孙蓬一1967年4月12日在全校大会上的讲话

(选自《新北大》1967年4月13日)

新北大公社红卫兵战友们,新北大公社社员同志们,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我代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红卫兵总部,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我们年轻的新北大红色政权面临着一场新的严峻考验!我们已经投入一场新的战斗!(群情激昂,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昨天,今天,从我们新北大上上下下,一切革命同志,万众一心,斗志昂扬的气概就可以给企图搞垮新北大那些人一记响亮的耳光!(热烈鼓掌,呼口号)请那些打着如意算盘、做着永远不可实现的美梦的人睁开眼睛看一看,我们北京大学从来有像这样斗志昂扬吗?!(热烈鼓掌)我们要感谢一些人,你们从反面给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课,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积极的克服“温”字老毛病的一个良好条件。(长时间热烈鼓掌)我们今天的

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北京大学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光荣传统的发扬和光大，就是“五·二五”“六·一”“六·一八”“七·一九”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发扬和光大！（长时间热烈鼓掌）如果有人怀疑北京大学有一支过得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队伍，那么，我们欢迎他们参加我们的大会，听听我们战斗的声音！（热烈鼓掌）这些天发生的事情，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很高兴的；但是，也有那么一小撮人，他们从另一个角度高兴。据说像樊立勤之流他们也在窃窃作喜，他们在蠢蠢欲动。同志们，我们能允许他们轻举妄动吗？

（不能！打倒樊立勤！）有一些人，自称是响当当的过得硬的左派，他们不和我们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却把希望寄托在他们所称的那种所谓的造反派，也就是被我们所击退的曾经控制我校井冈山、红联军的一小撮反动头头身上。难道说，你跟我们的敌对势力站在一起，我们就没有理由问一问你：你的立场站到那里去了？（对！鼓掌）有的人讲，我们北京大学的革命派对别的单位支持不够，从我们方面来检查，原则上应该接受这样一个批评，因为我们应该做得更多，但我们做得很少；另一方面，如果有人从这个角度根本否定北京大学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其他兄弟革命组织的支援，如果说不是别有用心，那你们未免太健忘了！（热烈鼓掌）我们并不想夸耀我们北大什么功绩，但是，既然有人尖锐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那么我们也不妨简单地说他两句。就以地质东方红为例，他们在最困难时期，我们北京大学的革命派支援了他们。从聂元梓同志开始到我们广大的同志，支援了他们。我们做得很不够，但那是我们努力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心是和那个时候的地质东方红革命造反派连在一起的。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态度呢？他们支持哪一派呢？就是他们那一小撮头目以朱成昭为首的支持我们北大的井冈山，北大的红联军。井冈山为什么能够加入三司呢，主要的责任就在他们身上。我们说，他们不仅没有支持我们的斗争，不仅没有帮我们的忙，而且是帮了我们敌人的忙，帮了我们对手的忙。这些问题，过去我们都不愿意讲，甚至一直到中央关于北京大学这一场长达几个月之久的阶级大搏斗，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的时候，他们迟迟不肯把臭名远扬的一小撮反动头头所控制的井冈山开除出三司去。以致最后经我们坚决的斗争，经中央文革的批评，

他们才不得已作出了一个开除的决定。朱成昭名义上现在是下台了，朱成昭的势力还在。我们有理由怀疑地质学院东方红，他们究竟在肃清朱成昭的影响方面做得怎么样？（对！掌声）我们绝不想干涉兄弟单位内部的事情，但是你们既然打到我们家门上来了，一些问题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据我们所知，现在正充当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充当了一个反我新北大红色革命政权的打手的急先锋们就是朱成昭的势力，朱成昭的残余的力量。

所以说，这一场斗争不是简单的、所谓左派内部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对！鼓掌）这一场斗争的最根本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和一切革命斗争的根本问题一样，就是围绕一个政权的问题。（对！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

如果说，在昨天我们有些事情还看不清楚，那么到了今天，那一小撮人的心是路人皆知的了。因为马路上都写了大字标语了，他们要干什么，他们的目的已经清清楚楚了！（对！）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的民族官事件本来是微不足道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对！鼓掌）目的是他们背后的那些人要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政治阴谋！当着党中央提出来，现在是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时候，当着党中央提出：“小分裂犯大错误，大分裂犯罪”的时候，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为了独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们就不惜来破坏大联合。他们的目的就是：一、搞垮红代会，独揽红代会的大权；二、搞垮即将诞生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高呼口号）他们已经公开提出口号来了，他们的矛头，不仅仅是指向聂元梓，也不仅仅指向我们新北大的革命同志，完全有理由可讲，他们的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对！）这决不是给他们引伸，更不是给他们扣帽子。因为他们自己的心理已经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得清清楚楚了。他们以攻击聂元梓为借口，直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要“新北大滚出红代会”，要“聂元梓滚出红代会”，“聂元梓没有资格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红代会的核心小组必须彻底改组”，要换所谓“老三司”，说“聂元梓凭什么当了红代会核心小组的组长”，“我们不信任你，到底是谁保你的驾”，要揪出聂元梓的后台。（全场群情激愤，高呼口号，誓死保卫中央

文革！唱语录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所以说，这一场斗争不是简单的内部矛盾的问题。

目前的这场斗争，既然意味着夺权，意味着无产阶级江山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因此，什么“委曲求全”呀，什么“忍辱负重”呀，让其统统见鬼去吧！（对！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呼口号）在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面前，我们只能当仁不让，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对！）因为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几个人，也不是为了我们新北大的小团体，是为了整个阶级，是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对！长时间热烈鼓掌）

有的同志提出，“这样做，跟我们的斗争大方向是否一致”（一致！）我们觉得，这没有什么不一致的。我们所以要批判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我们无产阶级红色政权。而今天，当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时候，有人企图捣乱破坏，这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这就是大方向！（鼓掌）

目前，从北京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出现这样一个状况，一方面整个的形势是大好的，而且越来越好；而另一方面存在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有一个方面：过去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爪牙们，他们也企图翻案。像中宣部、统战部就有那么一股势力，那么一帮黑帮爪牙，他们企图翻案，他们企图搞第二次反攻倒算。同志们，我们能答应他们吗？（不能！）也有另外一个人，他们为了达到他们垄断、独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这一目的，便不择手段，只要是可以被他们利用、为他们服务的，只要是支持他们的，他们不管这些人是什么派，就一律给他们送上一个最美丽的桂冠：“革命造反派”。而这样一种力量，采取一种非常不正当的手段，采取拉一伙，打一伙，拉拉扯扯，勾勾搭搭，招摇撞骗，把手伸得很长很长，真正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当他们跟别人辩论，他们提不出充足证据的时候，便拿出所谓的王牌，说：某某支持我们。不管什么人，只要你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他支持了你，那么他也是错误的！（对！）无产阶级革命者，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对！）我有必要再一次阐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一股势力的代表，这一股

势力的核心不在学校，而是一些机关，是真正的摘桃派，那是一些什么人？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如高教部的延安公社（对！）中央统战部红色联络站。（对！）至于还有一些单位，他们人数虽然很多，但是，在我看来，那只不过充当了一个打手，充当了一个工具！（对！）关于这几个组织的情况，我这里简单地说几句：比如说，教育部的延安公社，他们里面查明了的叛徒，起码有五个，（高呼口号：打倒叛徒！）有的叛徒是非常恶劣的。例如卢正义，根据现在的材料，表明他不仅仅是个叛徒，而且可能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一个特务；还有一个东北人，国民党攻占沈阳以后，她叛变了共产党，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当了官太太。1949年，她又混进了北京，混进了党内，现在也成了延安公社的骨干。还有一个女的，她的丈夫过去在河南做地委书记的时候，叛变了革命，出卖了革命同志，聂元梓同志的一个侄子，当时刚刚入党，只有十六岁，就被这个叛徒活活打死了。这是她丈夫干的，而这个女的跟她丈夫是一起的，所以她改名换姓。现在她很恶毒地咒骂聂元梓同志，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不是什么个人对个人，而是阶级对阶级！（对！）在这些叛徒内流传着一个非常非常卑鄙哲学，流传着一个什么论调呢，“越是叛徒越是左派”。同志们，你们说这个说法是不是混蛋啊？（是！）他们这种卑鄙无耻的说法遭到了延安公社要革命的同志激烈的反对，而且有很多同志公开造他们的反，揭露他们可耻的理论。（高呼口号：打倒叛徒！）这样一帮家伙，他们过去是“陶保派”，就是陶铸所保的那一派，也是“保陶派”。可是，这一伙，由于他们是政治投机商，他们靠闻出市场行情的味道，经常来一些出人意的手段，这样使他们在陶铸在的时候，是拥护陶铸的分子，等陶铸有问题的时候，摇身一变成为反陶的英雄，这些人是所谓的永久牌的高手。在我们看来他们是有奶便是娘的投机商（对！！长时间的鼓掌）就是这一伙得到了一些人死心塌地的支持。我们不懂，这到底是为什么？就是这帮家伙，做着美梦，他们做了夺权的准备，他们有一个升官图，这个升官图我们已经拿到了。他们做着非常如意的美梦，就是说在夺权之后，高教部教育部的第一把交椅就让卢正义来坐。我们打倒一个蒋南翔，能换上一个卢正义吗？

（不能！！）我们绝对不能。打倒卢正义我们有详细的资料，我们有调查报告，我们可以

向全市公布。还有一个，就是学部红卫兵联队吴传启们一帮人，吴传启到底是一个什么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他不是什么响当当的左派，而是一个在政治上值得大加审查的人。为什么呢？吴传启在抗战时期当过一个特务组织国民党军统特务报纸的编辑。抗战胜利后，吴传启当国民党的“大刚报”的编辑、记者，为国民党服务。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同志揭发，吴传启的社会神通广大，当你的东西丢了以后，在两天之内就可以给你找回来。就是这个吴传启过去跟人合作也写过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可是我们说，他是不是一个左派，不能仅仅以此为标准。文章写的漂亮，但那是演戏，是做给人看的。有的人说中央文革支持吴传启，我们没有这么一个消息。别的方面，我们看他在文革中干了什么？我们仅仅看他对反对他们的人采取什么态度。有部分群众反对硬把潘梓年作为当然的文革成员，而这部分群众就变成反对派。他们是怎样对待这部分反对派的呢？原来的对立面叫红卫兵总队，几乎所有红卫兵总队的办公室宿舍都被吴传启、潘梓年所控制的红卫兵联队所砸、抄，所洗劫，他们每闯进一个地方，就布置岗哨，割断电线，拿斧子、锤子砸办公室、档案柜，翻箱倒柜，动手行凶打人。不完全统计，自20号以来，学部红卫兵总队多名群众，有九十四人被打，几十个人被搜查，五十人以上被抄家，四十五人被非法斗争和绑架；有116个办公室、133个办公桌、41个保险柜和文件柜被砸被抄，被抢走粮票60斤，布票37.5尺，人民币200元和大量的私人信件和笔记，甚至有许许多多的毛主席照片。同志们，难道说坚决贯彻打砸抢，靠打砸抢起家的人，我们能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是坚定不移的左派吗？

另外一个单位到处发表他们的文章，到处安排他们的势力，这种现象不正常，是很值得我们考虑的，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对！！）有的人在外面甚至造谣讲，原学部的周景芳是中央文革成员，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事实上周景芳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外面造成一个假象。就拿我们的邻居人民大学来说，好像反对肖前就是反对吴传启，反对吴传启就像犯了弥天大罪一样。我今天就要公开表示，我们就是要反对一下吴传启（热烈鼓掌）。再就是红色联络站，以洪涛、刘郢为首的一小撮人在1.15档案事件中，就抢走了国家机密档案90箱，把政协的档案都全部抢走了，里面有很多国外的军事机密和资料情

报。抢了以后，分到个人手中，现在有许多重要档案都散失了。而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证明洪涛他们与已经被宣布为反动组织的“湘江风雷”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与宣布为反动组织的“红旗军”也有秘密联系。但是，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洪涛一小撮抢劫了国家大量机密的档案，在他们窃取国家机密档案的时候，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抗大公社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负责，制止了他们，把他们扭送到公安机关。而结果怎么样呢？抢档案的人成了革命派，而制止抢档案的人却成了反革命。红卫兵总部的郑仲兵同志被关到监狱十五天。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不问一问，绝对不能做奴隶主义，绝对不能盲从。（对！！）就是这一帮人，他们勾结在一起，凑成了现在北京市存在的最大的下山摘桃派。他们妄想通过一些阴谋手段，来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但是，我们要告诉这些先生们，我们这次文化革命一定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决不允许换汤不换药！正是由于这样，所以北京大学过去尽管很“温”，也为他们所不容。因为，我们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正派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变成了他们实现野心的一个障碍，一个眼中钉，所以他们来给我们制造矛盾，挑起斗争。现在，斗争既然由你挑起，这场斗争将怎样进行，就不以你的主观意图为转移了！（对！长时间鼓掌）同志们，我们必须看到，目前外面造成一种虚假的现象，似乎北大很孤立，似乎很多单位在反对我们，这是一种假象！我们相信，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朋友遍天下，与我们有分歧的同志，包括签了名××单位的很多同志也是支持我们的。所以，在我们分析当前北京市文化革命形势时，要看到这一点，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目前在某个问题上，跟我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他们还是我们的战友，这里，我再一次表示我的看法，像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他们是我们的战友，我们应当和他们一起战斗！（鼓掌，呼口号）我们完全相信，尽管目前存在着某些分歧，存在着某些误会，但是大家将会很快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将把我们几个单位紧密联系在一起！（鼓掌）

当前的情况是这样，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是委曲求全呢，还是针锋相对呢？

（针锋相对！）对！只有针锋相对，以斗争求团结，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团结亡。（对！

鼓掌）（高声齐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么，我们斗争的策略是什么呢？斗争策略，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应该是退避三舍，不打第一枪；“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鼓掌），我们这决不是感情冲动，决不是闹个人意气，这决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为了小团体，而是为了整个阶级，为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彻底解放！既然是为了这样一个崇高的理想，完全应该拿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迎着风暴，前进！（高呼口号）

今天到会的可能有兄弟单位的战友和同志们，我们公开地讲明自己的观点，如果有意见，欢迎你们批评。有些具体情况，由于我们出于种种考虑，其中还有“温”字在作怪，没有及时地向同志们讲，我们知道的情况，以后将陆续地通过广播台，通过大字报，宣传品，发给同学们，把情况交给同志们，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估计，我们深信，我们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都是善于思考的人，他们会从事实当中，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南，从其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绝不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派盲目地服从什么“总部意图”。早上地院一小撮人及一些受蒙蔽的人在我们学校肆意破坏以后，在我们学校开了一个所谓的控诉会，斗争了我们的同学，用了比对黑帮、对敌人更加残忍更加凶恶的手段残酷地迫害我们的同学，大家可以从这些事实中进一步看看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尖锐性。他们在我校捣乱后，到处造谣，拿出他们老的本领，倒打一耙，他们跑到我们的家里，打了我们的人，破坏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而说我们是什么犯了罪，世上哪有这个道理，这是地地道道的强盗逻辑！（对！！鼓掌）今天据说在地院聚集了一万多人开了所谓“誓师大会”，继续发动和挑动对新北大的进攻，我们怕不怕？（不怕！！）对！在我们无产阶级造反派面前就没有一个“怕”字，我们可以奉告这样一些人们，的确，从我们这方面来讲，我们一天也不准备打，一次也不准备打，但是你们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就坚决地奉陪到底！（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长时间高呼口号。）■

【书评】

读王复兴回忆录有感

舒声

读了《记忆》155期中王复兴的“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节选），深感抢救文革记忆的重要性。亲历北大文革的老五届学生，如今都已经年逾古稀，有的已经离开人世，如果不及时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留给后人，许多史实将被岁月湮没。从这点出发，应该欢迎王复兴和更多的校友写出回忆文章。王复兴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回忆了北大文革的一段历史，并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自己做的错事，如参与了批斗历史系教授汪篔先生的行为，表示悔恨和道歉，尽管汪先生早已含冤屈死，但能够得到这迟来的道歉，汪先生在九泉之下也许能稍微宽慰一点吧！

王复兴的回忆涉及到北大文革前及文革中的许多人和事，有些是他自己亲自参加的和接触的，有些是后来从资料中查阅或听他人讲述的，而他对这些资料和讲述又没有做认真的考证，其内容就难免会出现很多瑕疵甚至错误。他的这种文体既不完全是回忆录，又不是严格的历史研究论文，文章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被打折扣，很容易误导读者，使读者产生歧义。这种写作方法是否值得提倡，可以进一步探讨。

这里仅举几个例子，说明王文里出现的不应有的错误：

一、 搞错了一些知名人物的职务

宋硕、崔雄昆、杨克明、郝斌，都是北大文革中的知名人物，但王文里把他们的职务都搞错了。宋硕文革前是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王文说成是部长；崔雄昆文革前是北大教务长，王文说成是副校长；王文说：9月初（1966年）校文革成立，聂元梓任主任，孔繁、杨克明任副主任，事实上，杨克明只是委员，不是副主任；郝斌在1966年只是个历

史系青年教师，普通党员，王文却说他是历史系党总支副书记。像这样的错误，只要认真考证一下，就不会出现。

二、搞错了事实，张冠李戴

王文中说：“近年郝斌（文革前历史系党总支副书记、文革后曾任北大副校长）曾著文向在某大学任教的高海林隔空喊话，要高海林忏悔、道歉。周一良（历史系教授、文革后期“梁效”成员、文革之后曾任历史系主任）则著文表示“大家都信过神”，其意对高海林之事，应把这一页翻过去了。”

实际情况是：高海林（自称“炮兵营长”）是文革期间监管“牛棚”的历史系学生，向高海林隔空喊话的不是郝斌，而是周一良先生。郝斌先生不过是在《流水何曾洗是非》一书中记述了以下事实：周一良是高海林动手打过的人。文革结束之后，有人在周先生面前提到高海林，周先生一听这三个字，直口便说：“这个红卫兵在运动当中对我的迫害和折磨，其态度之凶恶、手段之粗暴，我是至今难忘。尤其奇怪的是，到1968年下半年，炮兵营长还带着他的军师——一名历史系教师，来到劳改大院，一再强迫我承认《乞活考》（注：周一良1948年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纯属考据之作）的反革命意图，说我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我当然坚决予以否认。请你告诉他，我至今不能谅解。”

而周先生在说过前面针对高海林的那段激愤之言后，仅隔两个月，又改变了想法。不知道是周先生严于律己，还是他反省自己的惯性发生了作用，这次他180度大转弯，说：

“文革这场灾难开始之后，几乎人人受害，我信了神，上当受骗，年轻的孩子们也同样信神，上当受骗。”接下来，周先生这样说：“我与红卫兵的情况只是上当受骗的程度不同，又有什么理由坚持不肯谅解呢？因此，我在这里向原新北大公社炮兵营战斗队的高海林营长喊话：让我们学习鲁迅先生所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吧！”

这是一位86岁老人的话，一位宽厚长者的话，多么理性的话！无奈高海林同他的“军师”两人，一个在河南，一个在北大，谁都没有给周先生一点回应，直到老人家离开这个

世界。¹

看来王复兴没有认真阅读郝先生的书，以致发生张冠李戴的错误。

三、断章取义，误导读者

王文写道：（1966年）8月时，历史系有二十几个干部、教师被关入“牛棚”劳改。到9月时，历史系文革委员会在昌平北太平庄（原历史系半工半读地址）设了劳改营，把关在燕园的23名历史系干部、教师移到此处。当时我们历史系一年级同学全不知道此事，近年才知在66年9月27日，向达、杨人鞭（注：应为鞭）、邓广铭、邵循正、商鸿逵、周一良、宿白、阎文儒、吴代封、郝斌、田余庆、徐华民等23人被送至此处劳动改造。一个月后开始分批返校，最后一批5人迟至67年3月返校。北太平庄的“劳改营”既清静又安全。当时还有两名患神经衰弱病的学生也一同到此处休养。按郝斌回忆，比起在燕园牛棚时的挂牌劳改，被人围观、辱骂，在北太平庄倒是清静了许多，少了许多侮辱。他说：“像北大校园那样整天的追逐、围斗，就幸免了。”

按照王文的说法，太平庄（注：这个地名叫太平庄，不叫北太平庄，北太平庄在海淀区北三环）的劳改营“既清静又安全”，似乎是个世外桃源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郝斌先生《流水何曾洗是非》一书中，确实写到：“像北大校园那样整天的追逐、围斗，就幸免了”，但是，请注意，这里是逗号，不是句号，紧接着，还有半句话：“可监管的学生又想出了新招。”完整的一句话是：“像北大校园那样整天的追逐、围斗，就幸免了，可监管的学生又想出了新招。”而且重点在后半句，王文为什么避重就轻，把逗号后边的半句话不引用完全呢？

郝斌先生记述的监管学生（即高海林）想出的新招是什么呢？

第一招是一日三餐，监管对象要在毛主席像前列队，弯腰低头，由被指定的一个人朗读一段“语录”，而后大家一起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接着，一个一个地分别报出自己的姓名，但在姓名之前，要加上自己的“帽子”。这种先报门才能进食堂的规定，

¹ 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台湾，大块文化，2014年，第92、94页。

是对监管对象的莫大侮辱。

第二招是学习“毛选”，互讲认罪心得，时不时地就来一次。著名学者向达先生当时已经66岁，一次刚刚开口讲话，高海林已经跳了起来，喝令向先生站立，低头、弯腰，大骂他“抵制监管，反攻倒算！”直到向先生的双脚肿的很厉害，才准许他回学校看病，被诊断为尿毒症，入院时已成不治之势，医生也无力挽回，1966年11月24日离世。

第三招就是批斗会，而且创造性地把批斗会在断崖边缘进行。一天晚上，批斗教授杨人楩，让他交待一个“历史问题”，杨一口咬定绝无此事，斗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战果，高海林一怒之下说：“走！到外面去！”他把杨氏夫妇加上监管对象一起带出宿舍，上了山，来到一个断崖的边缘。高海林让杨先生站在崖边，背朝外，脸向里，其他人围成半个圈子，高说：“你交待了，我放你回去；你嘴硬，我把你推下去！”崖到下边有10多米，谁也保不准他真的手一伸，弄出一场骨折魂消的惨剧。就这样批斗到半夜，才回到宿舍。¹

仅举以上三例，就可证明太平庄的“牛棚”绝不是什么“清静安全”的世外桃源，而是残酷侮辱迫害干部教师的场所。王文截取郝斌先生的半句话就轻易下结论，实在是断章取义，误导读者，甚至有为高海林等人开脱之嫌。

文革已经过去四五十年，我们都已垂垂老矣，人的记忆力下降是不可避免的。王复兴是历史系毕业生，希望他拿出历史学者的严谨作风来，多下点考证功夫，如果自己没有把握，最好对有关资料多认真地读几遍，或请他人帮助校阅一下，尽量减少发生类似错误。我们期待他纠正自己的错误，写出真实可信的回忆录来。■

¹ 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台湾，大块文化，2014年，第74、75、78、88、89页。

【述 往】

文革琐忆二则

——我在北师大的日子

岳瑞民

1966年夏天我担当“牛倌”的日子

1966年6、7月份，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牛鬼蛇神”都集中到一个地方，日夜吃住在那里，不许回家。这个地方俗称“牛棚”。

大概是物理系“文革领导小组”指派我管理这些“牛鬼蛇神”。那么多参加造反同学，为什么偏偏选择我呢？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是第一任“牛倌”。

因为入校至今还不到一年，接触到老师很少，所以“牛棚”里关押的老师基本都不认识。印象深刻的有：金永龄，物理系主任。

吴碧华，物理系党总支书记。

郑华智，物理系教授。

祁开智，物理系教授。1971年，驻校“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挖“特务”时，跳楼自杀身亡。

吕烈阳，物理系教授。

好像还有赵亮坚，物理系讲师。1966年文革初始，揭批“牛鬼蛇神”时，与其夫人王荣一起，双双手缠电源线自杀身亡。

这些“牛鬼蛇神”的任务或工作有三个，第一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背诵毛主席语录，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和文章；第二是交代罪行，写交代材料；第三就是参加体力劳动，叫做“劳动改造”。



（清华大学学生在批斗他们的教授和老师。资料图）

我的任务就是监督他们劳动。所谓“劳动”，就是到学校大操场边缘拔草。他们蹲在地上，弯着腰，低着头，徒手拔草，一根一根连根拔起，直到拔得干干净净。6、7月份的北京，已经是很热了。天上的太阳火辣辣的照着，地上被晒得滚烫，操场上就像是蒸笼。他们必须在太阳底下干活。我则坐在大树下荫凉地里，监督他们。四周经常有好多学生围观，嘻嘻哈哈，指指点点，还不时地对那些干活稍有怠慢的“批斗对象”呵斥几句。

大概第二天吧，反正没几天，那天太阳特别毒，下午开工不一会儿他们就一个个汗流浹背了。突然，在围观的同学中有人叫了起来：有人晕倒了！我急忙抬头一看，是吕烈阳教授。我不乐意地走到跟前，厉声喝道：起来！他不动。我仔细一看，只见他脸色发白，口吐白沫，浑身抽搐。我见情形不对，就叫其他几个老师把吕烈阳送到学校医院去了。还好，没死。休息了几天又来劳动了。

后来，又有吴碧华老师生病住院了。十多年后，大概是1979年，我才知道她不是“病”了，而是当时她怀着孕，不幸流产了。

发生了这两件意外后，我心里确实害怕了，人命关天哪。于是就有退出不干的念头。也不记得是怎么回事了，反正我不再当“牛倌”，由别的同学接替了。

45年之后，也就是2011年。我给北京师范大学的吴碧华老师打了电话。她和她的丈夫都已经退休。

我说：吴老师，我在文革中对不起你，害得你流产。

吴老师说：这也不能怪你，当时就是那样的形势。

我说：话是这么讲，但我还是有责任的。别人的责任别人承担，自己的责任自己承担。还是各负其责吧。

一句话触犯了陈伯达



毛泽东与陈伯达在天安门城楼交谈（资料图）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极大地鼓舞了红卫兵深入批判刘少奇的热情，一时间校园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主题就是“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我也要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啊。可是不知道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事实，因为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学习的政治课本以及党的历史教材，都丝毫没有提到刘少奇还有这么重大的罪行

啊。看到有一批中文系写的大字报，批判刘少奇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倡什么“国防文学”，说这是“叛徒、汉奸文学”，并说明资料来自一本书，叫《中国文学发展史资料第四集》。于是赶快到学校图书馆去找，没想到还真借到了。

把书打开来，认真阅读。找到了，有一篇文章署名“莫言”，据说这就是刘少奇的化名。这篇文章就是刘少奇“汉奸”的铁证。翻着翻着，发现有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两个口号的论争可以休矣》，署名“陈伯达”。啊？好好看看。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

原来在中国抗日战争前夕，就文艺界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以“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先锋”——鲁迅为首的左派知识分子提出一个口号，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而以周扬、郭沫若等为代表右派知识分子却提出另一个口号，叫“国防文学”。于是文艺界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激烈论争。

陈伯达在《两个口号的论争可以休矣》这篇文章中，用十分坚定的口气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并建议“休战”。这不明明是在反对鲁迅吗？于是，我就不加思索的说了一句：“陈伯达这篇文章是反对鲁迅的！”我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么一句话，可捅了马蜂窝了！

陈伯达是什么人？陈伯达曾是毛主席秘书，文革之初被毛主席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第一副组长；康生是顾问；张春桥是副组长；姚文元是成员），后来在中共“九大”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在毛主席、林彪、周总理之后，位居第四。陈伯达在“文革”初期曾被周总理誉为“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称赞他是“最善于发挥、善于阐明毛泽东思想，使我们得到很多好处”的中共理论权威。

天哪，当时我怎么就这么愚蠢、这么鲁莽啊？这可是犯了大忌呀！根据文化大革命的逻辑，我的这句话很容易被人“上纲上线”为“反对陈伯达”；而反对陈伯达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也就是反革命！果不其然，我如此鲁莽的一句话，很快引起驻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高度警觉。不久，就有同学秘密地将这一可怕情报告诉我了。当时我就吓傻了。这几位同学就给

我出主意，叫我“死不承认”。可是我说，当时好多人在场，怎能抵赖掉呢？他们又出主意，叫我说“自己理解错了”。可是我说，凭我的智力是不会理解错的。结果他们几个也没有主意了。当时我想，很可能把自己打成“反革命”。即使没有如此严重，那在我的毕业档案里写这么一条，自己这一生也就完蛋了。这可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我几乎每天都在思考怎样才能度过这一难关。一天又一天。……

谁能想到，后来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1970年夏，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批评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明确指出陈伯达“追随王明，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一贯投靠和追随刘少奇，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秀才和头面人物”。随后，中共中央又在1973年召开的“十大”上给陈伯达正式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文革结束后，我才知道，那段日子里，有一个人受到我的牵连，也因此事倒了大霉。

这个人姓张，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当时是兰州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怎么会牵连到他呢？原来，当时我在看那本《中国文学发展史资料第四集》时，他也在场。他回到兰州大学后，也像我一样多嘴多舌，把“陈伯达在30年代反对过鲁迅”的话说出去了。结果同样引起驻校“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高度重视。于是打算组织对他的“反革命言论”的批斗会。开批斗会，就要准备批判材料。可是，“工宣队”哪里会了解党在30年代的历史？而且他们也看不懂《中国文学发展史资料第四集》中的文章。于是责成中文系的几位老师研究。这几位老师经过认真、慎重地反复研究，这样向“工宣队”汇报：书是真的；文章也是真的；文章的署名确实是“陈伯达”，不过有可能是另一个同名同姓的人。这样他们算是搪塞过去了。“工宣队”呢，虽然心犹不甘，可也没办法，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

【述 往】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四）

——逍遥中的困惑

宋翔雁

一、病中的“逍遥”

自六七年九月中下旬简报组停止工作后，我就离开了学九楼，逐渐过起了逍遥派的生活。从一个虔诚地要求做一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锻炼自己，渐次转变成一名逍遥派成员的直接原因是：从九月底起，我经常发现自己肝区疼痛，且大便不成形。经北医三院检查，发现胆红素指标超高，但原因难以确定，只是让我服药并全休（当时医院开诊断证明给假一般最长只给半个月。若需继续休息，则必须再挂号就诊，经检查确诊后，再由医生追加假期。因此，若需延长假期，我必须每两周抽血化验一次。这不仅繁琐，而且也极易交叉感染。故经过一段时间后，我向教研室领导小组提出，可否一个月交一次假条？因当时院内的运动进展情况抓得并不很紧，他们研究后同意）。在这种情况下，不逍遥也得逍遥了。三院的检查和治疗大约一直进行到年底，肝区的疼痛和胆红素指标均无明显改善，而且还经常出现腹胀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我姐姐让我去西苑中医研究院看中医。经中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肝炎后胆红素增高症”。除继续全休外，连续服用中汤药并辅以西药维生素 B12 针剂治疗。这样大约治到六八年二月底，病情就大大好转，尽管胆红素指标依旧有些偏高，但已不太吓人，而且其他症状也基本消失了，从而结束了全休状态。但每次复查时，若胆红素超过一定数值后，大夫还是继续让我半休。

除了患病这一直接原因外，让我渐次走向逍遥的重要原因是思想上起了变化。变化主要是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和中央文革在运动过程中的行事方式、作派等产生了一些抵触和怀疑。从而使我对中央文革的信任度产生了动摇。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件事引起的：

1. 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前后，中央文革开始把其重要成员之一的王力捧上了天，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大会，欢迎王力脱险回京。但时隔不足半月，在王力“八七”讲话后不久，中央又以“反党乱军”之名将其逮捕。与此同时，在文革之初声名赫赫，且在中央文革小组中与王力齐名的关锋、戚本禹二人，先后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由被罢黜。而关、戚二人，恰恰又是“东方红公社”的有力支持者，也是“东方红公社”近一年来执行“在外、向上”路线的唆使人和推动者。正因为王、关、戚等人与“东方红公社”有这种特殊的关联，所以很自然使我将“王、关、戚”事件与地院“东方红公社”“朱、蒋、杨”三小将走向反面相类比。坦诚地说，前者在我心底里产生的震动远小于后者。因我认为，朱、蒋、杨毕竟是学生，心地单纯，仅凭激情和对伟大领袖的忠心投身文化大革命，因不懂政治、不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而犯错误或大错误。而且，我还觉得朱、蒋、杨等人的犯错与党内一些老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犯错有某些类似之处。当初这些老同志也风华正茂，他们凭着拯救中华的理念，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带来的马克思主义而投身革命，但在其后的斗争中犯了各式各样的错误甚至是路线错误，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到民主革命的胜利。基于这种类比，所以当时我心底里认为，朱、蒋、杨等人的错误虽是严重的，可以免职。但应允许他们继续革命，假以时日，说不定有可能和民主革命时期犯过路线错误的老同志一样，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应当承认，对朱、蒋、杨等人错误的这种认识，在他们被隔离审查时起就有，但因当时对中央文革的认识绝对正面，因此只不过一闪即过。而当“王、关、戚”问题暴露时，我对中央文革的绝对信任已有所变化，所以对朱、蒋、杨问题的认识就出现了上述改变。但我深知这种想法存在的危险性，所以直到今日之前，我也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但“王、关、戚”则不同，他们是一批打着革命旗号的政客，目的是打倒反对他们的“政敌”，取而代之以谋取更大的权力。所以“王、关、戚”事件的出现，带给我的只是更深一步地看到了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给我的警醒则比较消极的保护好自我的处世理念。即像我这样出身不好又不懂政治的人，还是远离政治为好！

时至今日再看，我才似乎懂得：王、关、戚等人实则也是伟大领袖文革战略总布局中的几枚棋子而已，一当事关大局因矛盾激化需要重新考虑力量或权力平衡时，则需要抛出一些替罪羊来缓解被激化的矛盾，维持大局和总体的稳定，以利再战，达到他老人家所设计的最终战略目标的实现。具体到当时的现实，就是群众运动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裹挟下已显现出失控的苗头，激化了与掌握枪杆子的军队间的矛盾，危及到毛政权本身，故不得已只能“杀卒”以谢国人，使被激怒的部队能够稳定下来。

2. 大约在六七月间，伟大旗手江青在某高校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不记得因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公开咆哮地向小将们喊道：像周荣鑫这样的人，你们还不赶快去把他抓起来（周荣鑫时任教育部长）！对于这种在群众集会上公开鼓动群众去抓中央干部的作法，让我感到不可理喻而难于接受。而且联想到自文革发动以来，江青曾多次在不同类别的公开场合讲话中，点一些领导人的名字并给以严厉的指责，从而诱发了小将们对这些领导人的冲击和批斗，而这些人是否有问题和问题的性质是什么，并未经过相应的组织程序审定。对江青个人的这种盛气凌人的霸道作风，让人越来越反感！我内心的这种感觉，曾在1967年夏季一次与刘昭明的闲聊中，无意中向她谈论过。

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我骑车回前述父执的家，大约骑到师范大学时，遇到了她也骑车进城。我们一同骑到新街口豁口处要分手时，彼此停下来说了会儿话。她问起我近来忙什么呢？我说已经不太忙了，而且我也不大想继续做了。她又问起原因，我告诉她这段时间资料上不来，我想跟上面反映，暂时停下来（指简报）。另外，有些事情我也看不惯，于是就把对江青的看法讲了，但也嘱咐了别对他人说。之所以要谈及此事是因为，1968年当我们俩准备结婚时，我曾带她去父执家看望，老人见到她很高兴，我感到老人对她很满意。

拜望毕，我送她回家后再返回老人家中，想听听他老的真实看法。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当他肯定了昭明的很多优点后，特别严肃地嘱咐道：她太单纯，以后政治上的事不要和她多讲。所以当抓“五一六”把我隔离起来后，因我曾向她谈到过对江青有些负面看法，于是这就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我极其担心她会在军宣队和专案组的“劝说、诱导”下，出

于对党的信任（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性），交代（或揭发）我的上述言论。若如此，则定罪现行反革命，就确实是板上钉钉了！

这块心病一直折磨我到解除隔离之后——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不是与妻子彼此相拥，好好看看、亲亲儿子，而是迫不及待地悄声问她：1967年夏我们在师大偶遇同行至豁口时，我们聊天说的事你还记得吗？她回答说：怎么了？我说：就是想问问你是否还记得当时我们聊天的内容。因赵璧媛（抓“五一六”积极分子，后来大约成了我专案组的负责人，也可能是干校抓“五一六”的负责人。这里提及赵只是我无奈找的借口而已）还让我再想想简报组的事，我觉得自己都交代清楚了，但还想问问你，因为当时我不想再干了，好像和你谈过一些简报方面的事。她想了想后说到：我一点也想不起来，连豁口相遇的事都不记得。听后我就说：你不记得就算了，甭想了。反正我觉得都交代清楚了，就到此为止吧！

（当时，我生怕再勾起她的回忆，她能彻底忘记最好，我也就彻底“安全”了。我之所以绕个弯打马虎眼似地问她，一方面是怕直接相问等于再次告诉她这件事，如同再次“放毒”，反倒坐实“罪证”；另一方面是因为干校的住房非常简陋，屋顶三角房架支撑的顶部空间都是连通的。隔墙也只是土坯垒的，缝隙很大，墙面也不抹灰，所以各家的住房都不隔音。故我担心这样的谈论若被别人听到后，再向上反映可就糟了）。

这件事直到20世纪末，她初中时一位好友的弟弟（美籍华人）回国在北京聚会，彼此聊到文革时期人与人的复杂关系时，他说因和朋友言谈中说起过一些江青三十年代有关情况，被别人揭发后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的经历。这时，我也将自己和昭明谈论江青的事和盘托出，道明此事在我被隔离审查时带来的后怕和对我的折磨。但昭明听后显得很无奈地说道：我确实一点都不记得了。对此，友人开玩笑地说道：如果你当时还记得，我看宋兄那就真该倒大霉了！听后，大伙儿哈哈一笑。

在逍遥初期因身体不适，不再直接介入学校内部的运动进程，对校内外发生的相关事情，也只是听听而已。但因我曾是地院摩托车队的负责人之一，而且是地院摩托车队内唯一拥有驾驶执照的队员。因此，一些学生，特别是动态组的学生，时不时的会求我开车带

他们外出看大字报、找人和收集情报。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次是1967年底至1968年初，动态组负责人吕××找来了一辆苏式依日-49型三轮摩托车（属重型四冲程），让我带他去建外社会科学院看大字报。到后，他即在社科院正门的大院里观看大字报。我则想借此空闲检查一下车子（因该摩托车变速箱可能有点毛病，在来的途中就曾熄火两次）。因车上没有足够的工具，故我只能通过调整怠速油门，利用二档直接启动。在他看完大字报前我就调好了。在回校的路上，他主动说起这次主要是想看看有关揭发潘梓年的大字报，因为他是潘汉年的哥哥，江青在接见红卫兵时，已多次提起要注意潘梓年的问题了。当车快行至师范大学时，他说想去师大找个人。于是我们就从师大东门进去，直接将车开到了师大主楼。进楼后我们乘电梯去到他找人的地方，只见他进屋后与一男性学生打招呼后就一直在聊，间或听到他们的谈论，主要还是围绕潘梓年的事，我估计双方是在交换有关潘梓年个人历史方面的情报信息。因我已处身世外，对潘梓年的事所知有限也不大关心，所以我就自己在室内随便翻看一些摆放在桌上的油印资料和报纸，并未介入他们之间的谈论。

在这段时间里，因服中药，煎药就成了我的一个负担。因我当时仍住在集体宿舍，只能用自己装配的简易电炉在白天非用电高峰期把药煎好，以避免电源保险丝熔断造成断电影响大家。此外，煎药不能离人，也就把我拴死在宿舍里，这样倒好，等于强制我在宿舍里休息了。自服中药后，病情很快得到控制并日趋接近正常，可能就与这种“强制”有关。

二、有了一间十平米的家

当进入春暖花开的季节时，我的肝功指标已基本稳定在一个略高于正常值的水平上了。大夫言要完全恢复到正常范围内，看来有相当难度。鉴于其他异常感觉均已消失，故建议停药汤药，改服丸药以利巩固。而且建议今后可改为两到三个月复查一次，现仍继续半休，但没有必要为续假专门来院复查，但自己必须注意控制活动量，少吃油腻食物。我叹服这位老中医的水平和医德，回校后十分认真地按大夫的嘱咐管好自己的生活。

在肝病压力基本解除的同时，我与昭明之间的交往也越加频繁，进入五月风和日丽、百花盛开的季节，我们决定共结连理。为此我还专门去西苑中医研究院向老中医咨询，请教目前情况下是否可以结婚。老人家爽朗地笑道：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向我道喜。让我感到他不仅是位令人尊敬的好大夫，还是一位让人可亲的好长辈。同时我还向他请教了在共同生活中是否需要注意预防传染的问题。对此，他又对我进行了科普教育，说到：你是肝炎后胆红素增高症，这时甲肝病毒早已不存在了，没有传染性，放心就是了。这样我也就不再有什么包袱了，因我不愿意对她造成任何伤害和不良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结婚在形式上不仅要搞得隆重，而且还特意追求豪华和张扬。但在文革特有的政治环境下，这些都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加之，因我们的出身都不好，一些人过去对我们还有过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的结合采取的是极度低调。除因婚姻登记需开证明、需申请结婚用房，我们不得不向系革委会办公室相关人员打招呼外，我们只告诉了几个最关心我们的朋友。其他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的。新婚之日没有任何仪式，只是在五道口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算作是我们的结婚照了。

当写到这里时，我想说一句心里话：我们由衷地感谢探工系掘进教研室的任大本老师（他是我系工会的负责人，是50年代中来华苏联专家培养的第一批的研究生），感谢他为我们争取结婚用房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因为地院职工住房是很紧张的，一般职工结婚多数都是暂时借用，符合条件的双职工，也需再等待分配。但任老师在与院行政处房管部门打交道中，多次反驳房管部门的“歪理”（指刘昭明北京家中有房，不能分房），指出现在刘昭明家中是祖孙三代租住的一间住房和一间厨卫同室的房间，并交出了他的调查材料。同时强调中央和北京市分房是以男方为主的政策，不应拿昭明母亲有租住房说事。此外，还强调我们是五十年代毕业的教员（刘昭明是1960年毕业的）是晚婚（31岁）等理由。

在任老师的多次力争下，房管部门最终在眷属楼单元房中分给了我们一间10平米的住房（与物理教研室的高老师合住一个单元）。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当我们拿到钥匙去看分给的房子时，才发现分给我们的住房已经放有物理教研室另一年轻的时老师

的东西了，可见当时对此房“争抢”的激烈程度了。但任老师在交给我们住房的钥匙时，对争抢过程中的难度却只字未提，似乎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我知道的这些情况，已是在数月后一次去同单元一层居住的郭声远老师家拜望时，听郭老师告知的（郭老师当时是掘进教研室主任）。从这件事也可看到任大本老师人品的一个侧面。

逍遥的日子也为婚后的两人生活提供了相对充裕的时间，除了在各自教研室参加学习、讨论外，对院外的事已经不大关心了，对院内的事主要也只是听听而已，完全不再卷入其中。但总觉得对下一步学校运动怎样进展，感到茫然。虽然革委会也根据中央的精神，提出“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等，但我们尚未感到有多大压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相互提醒着，注意在说话、做事上以谨慎为好，少出头、少惹事，能过上平平安安的日子就好。可见逍遥的心态这时已渐渐成了自己思想的主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随着时光的推移，到68年夏季似乎已经失去了运动初始时对自己的那种鼓舞和激励。究其原因除新婚后的分心和身体上还有些小恙外，很重要的原因是思想认识上与当时进行的运动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三、复课闹革命与“清队”

1967年底，革委会根据中央精神，在校内开始了“复课闹革命”，从而结束了近一年半的停课状态，学生们回到了原有的系、年级和班级，重新开始中断了近一年半的室内教学。应当承认，在经过一年半停课闹革命后，可以说绝大部分学生表面上还是遵从革委会的要求，回到了学校、进入教室，听课、复习、完成老师布置的相关作业。形式上确实基本上做到了复课的要求，学生们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求知欲望。对于革委会的这一决定我认为正确的，也是支持的。而且严格讲，这也是在中央感到对文革运动的领导有某种失控后，所采取的纠正措施之一。但我认为革委会在落实“复课闹革命”这一任务时，却缺少宏观的设想和要求，也缺少细致而周密的设计和安排。采用的仍是一哄而上的运动方式来

领导。既没有看到已被严重破坏了的学习环境、氛围和学习素养的重建谈何容易；也没有让教师和学生很好地领会中央所要求的“复课”和“革命”的内涵与关系。今天看来，那时中央对复课闹革命也未准就有清晰而完整的指示下达，这从其后直至文革结束之前，无论是中央文革或当时政府主管高等教育的相关机构，均未就高等教育如何改革，和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战线上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等重大问题有过任何实质性的重要文件下达即可证明。就我所知，只是在1973年停止高校招生达八年之后，方就以推荐的方式，从上山下乡的知青中“选拔”工农兵学员，才有了相关的文件下达。即使这样，为了“选拔”工作，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还因害怕被扣上走回头路的帽子，不敢把选拔过程中的文化水平检测说成考试。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白卷先生张铁生式的闹剧干扰。所以我认为，“复课闹革命”很可能也就是一种召回在社会上冲冲杀杀的学生，以恢复中央领导权威的一种手段而已。所以，“复课”一开始就遇到如何与中断前的教学进程接续好这一难题，而且越到基层就越觉得难办。譬如我当时所在的半工半读教研室已失去了“半工”的现场条件，各门课程如何接续就成为一个很现实而且确实不太好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教研室领导既不同意先按“全日制”教学大纲要求“填平补齐”，怕被扣上走回头路的帽子；又担心原本的半工半读教学大纲是在刘少奇“理工科大学要搞半工半读”的指示下制定的，完全照搬已因没有“半工”的现场无法实施，而且还有政治风险。故领导小组则希望能尽量通过实习室的参观来弥补，弥补不了的再以室内讲授或自学解决之。正因为有这些具体问题的存在，而又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故“复课”的真正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对这种以运动的方式开展教学工作，有大跃进时期的教改教训在先，我仍认为是不可取的。但因我当时尚处于全休养病阶段，当休假期限结束而我未拿到新的假条时，才会去教研室参加活动，所以室领导并未安排具体任务给我，这既是一种照顾，同时也使我回避了在如何“复课”问题上的争论。得以在复课闹革命阶段作壁上观，掩藏了自己内心里的真实疑虑。

应当承认的是，在“复课闹革命”这个环节上，革委会是按中央指示执行的。地院小将们也按要求回到了学校、坐进教室，这在北京乃至全国也带了好头。但这只不过是把中

断学业走向社会搞串联、打派仗的学生们，重新收拢到学校并进入教室而已。它只能使学生免于打派仗，对学生的知识获取则极其有限，至于说什么是“对教育革命的深化和探索”，那更是无稽之谈。即使有所讨论或辩论，也不过是纸上谈兵，肤浅得很！

进入1968年后，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和整顿革委会领导班子。因“清队”本是文革的应有之意，况且当时我坚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故思想上并无抵触。就个人而言，自己既无历史问题，文革以来的表现也是明摆着的，所以也无包袱和压力，应能积极投入运动并接受教育。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清理和整顿的矛头，很快就指向了已被结合进革委会的老院长高元贵身上，并以“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名目公之于众。我对此不禁疑惑丛生，更令我吃惊的是，高院长在师生中的人望是其他干部难以企及的，反工作组的导火索就是因工作组把运动的矛头错误地指向高元贵而点燃的。难道这些刚刚发生事，就那么轻而易举地翻转了？郑伯穰，我虽知其人，但我与他没有任何接触；反工作组才知晓。他们二人都是因反工作组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怎么会时隔不到两年又成了反革命呢？因此，高、安、郑问题的抛出，我思想上非但无法接受，而且还觉得革委会在拿自己的造反历史开玩笑，自己否定自己！但因自己逍遥了一段时间，对内中的因由一无所知，加之此间又发生了杨雨中跳楼自杀的事件，思想上更觉茫然，故在所谓的揭批“高、安、郑集团”问题上，我就以不了解情况作挡剑牌，基本不发表什么意见。

四、教育革命回顾与总结展览

约68年初夏，革委会主办的地质学院教育革命回顾与总结展览经长时间的筹备终于揭幕了。当我们观看之后，我的第一感觉是：展出中内容是真实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可以证实。第二感觉是：这些探索是在党的领导下，是为践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而进行的。展览的图片、文字和实物都印证了这一结论。与此同时，该展览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

问题：展览与文革提出的十七年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评价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而且，展览涉及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主要部分中，1958年“大跃进”为保证“钢帅升帐”的需要，地院师生在全国各地的寻找铁矿和勘探铁矿资源的教学实践，恰恰发生在高元贵主持地院工作之时。那么，高元贵究竟执行的是哪条路线呢？当我再深入思考这一看法时，不禁觉得这个展览孕藏着极大的风险，它不仅否定了对高院长的定罪，而且否定了对十七年评价，这可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当然，我不了解革委会主办该展览的意图是什么，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展览的审查者又是谁？事后对该展览的效果、问题等是否有总结？

今天当我在写这段回忆的时候，我还在问自己：当时看完展览后的感觉，会不会是由于当时自己思想上有些不同的看法、想法而产生的“错觉”呢？但答案是否定的。因我清楚地记得，当看到在三年困难时期，为减负要求教学中贯彻“少而精”的教学原则时，展览展出的图片中，就有由我带队的58级探机专业在密云边实习边讲解钻机结构课的照片。我问身边的一位老师：这与你们在现场搞半工半读时讲课有何区别？他回答说，我们回校后，大纲要求对现场讲解过的内容，在室内需进行必要的深化。对此，我当时也说到，那会儿回校后，对设计专业学生还要讲结构设计和结构分析，也是深化呀！所以当时在我的脑海里，就留下了文革前推行的“半工半读”，与困难时期执行的“现场教学”大同小异，差别可能主要在“半工”上，因为前者学生是以工人的身份定班、顶岗的，而后者仅以实习身份参加劳动，学习和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罢了。

展览后来顺利结束了，工、军宣队尽管干了一系列的整人勾当，但并未拿展览是问，真是万幸。我这个人比较机械，思考问题爱刨根问底。面对工、军宣队没有再去审查教改展览有无问题的现实，我仍在想难道真是简单的疏忽吗？所得结论仍然是否定的！

如今我的看法是，文革初期中央之所以反复强调否定十七年，目的就是为了给打倒刘少奇造舆论，一旦目的达到了，对十七年是否必须彻底否定已经不再是主要问题了。而当时，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给刘少奇做了结论，全国各级党政机构已经“一片红”了，所以工、军宣队的注意力自然没有放在是否有人在为十七年涂脂抹粉上了。 ■

【读者来信】

1. 章铎纠错

对《记忆》159期的纠错：

第41页倒数第1行：“毛泽东万岁！”、“毛泽东革命路线万岁！”……原文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文革中，没有“毛泽东万岁”的提法，虽然“毛主席”与“毛泽东”是同一个人，但轻易用“毛泽东”取代“毛主席”，叫我们这些亲历文革的人，听起来感觉怪怪的，也不符合当时的用语。其他文章，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请贵刊编辑注意。

第54页倒数第5行：“不久，地院附中就发生了学生温家驹被打致死事件”——原文是：“不久，就发生了地院附中学生温家驹被打致死事件”（事情发生在北大，而不是地院附中）。■

2. 陈创闯谈宫香政之文

宫香政《谁之过——北京大学文革前和文革中政治大分裂原因初探》，第6页（全刊第7页）第3段提到“哲学系心理专业56级安徽籍学生黄某某因言获罪，被开除回乡（大饥荒时安徽省饿死人较多）。他对被开除感到非常冤枉，在家乡不服管教，后来被枪毙了。四十多年后，才得到平反。”这里的黄某某即黄立众，这句话对黄的死因和平反情况描述不准确。

经查，黄立众，1936年12月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195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1960年6月被开除学籍。1960年下半年黄在无为县组织“劳动党”，并预定在1961年春节进行武装暴动。未及暴动即案发，1961年黄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其余同案被判无期徒刑至三年有期徒刑不等。自1961至1970年黄一直被关押在无为监狱。一打三反期间，1970年7月无为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判决黄立众死刑，1982年安徽省高级法院批复无为县法院

刑事判决书说“黄立众为首成立的组织是非法的，错误的，原判以反革命集团罪处刑不当，属冤杀，其余被告均宣告无罪。”（见谢贵平《大跃进中的黄立众“中国劳动党”暴动事件》，《二十一世纪》二〇〇六年六月号）■

3. 张晓良谈 159 期封面

《记忆》第 159 期“北大文革专辑”之十，封面配有北大字样的文革图片。此图为“1966 年北大红卫兵在‘反修’大会上”，作者翁乃强，中国知名摄影家作品档案网有载 <http://www.fotocn.org/wennaiqiang/3406>

近日我在网上看到几幅图片，与文革有关，惜拍摄者、地点、时间均不知。转发给你看看，尺寸较大，很清晰。

另外，第 26 页第 3 段“让后再搞李富春”似应为“然后再搞李富春”。■

4. 杜光来函

收到《记忆》，知道了北大文革的许多情况，谢谢！■

5. 乔晞华谈皮皮侠的建议

谢谢发来的 159 期。对皮皮侠的建议，我提一点不同看法。他（她）说的有道理，通过会员制可以促使有兴趣者加入义工的队伍。但是凡事都有利有弊，这样一来会把本来有点兴趣，可又不愿出力或没法出力的人挤出圈外。目前的情况，写书的人比看书的人多。人家有兴趣能来读你的文章就已经不错了。贵刊可以广招义工，通过自身的努力解决困难。

以上意见供参考。■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梦梨洲

本期审校：尚在田 梁幼志 梅立洲